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 绿色和平组织合作项目

## 汕头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的人类学调查报告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2003年9月

# 目 录

背景与前言 .....	4
调查的缘起.....	4
调查目的.....	7
第一章 生活在贵屿 .....	8
贵屿第一印象.....	8
贵屿——两个世界的生活方式.....	9
富足、传统、压力与惶惑：本地人的生活 .....	11
富足的经济生活.....	11
富足的背后——拆解业的负面影响.....	12
传统与现代——传统价值观念对贵屿人影响.....	13
宗族势力与权力结构——贵屿生活的权力背景 .....	14
子女抚养与教育——“贵屿人”的构建和塑造方式 .....	17
从这个世界看另一个世界——与外地人的关系 .....	18
惶惑的未来——压力之下的未来期望.....	18
另一种的客家：外地人的生活.....	20
聚族而居的“新客家”——在贵屿的外地人 .....	20
中年夫妻——外地人的特征.....	21
艰辛和单调——在贵屿的日常生活 .....	22
身份与差异——外地人的职业类型 .....	22
不停变动的零工和散工——外地人的工作方式 .....	23
“一脚踢”的工资——进厂工人的工作与待遇.....	24
从一个世界看另一个世界——与本地人的关系 .....	26
向往故乡——外地人的期望和未来.....	26
小结：.....	27
第二章 贵屿的生产与组织 .....	29
2.1 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的特征.....	29
2.1.1 无形的网络——基于宗族的生产与组织： .....	29
2.1.2 低成本和高利润——贵屿拆解业的成本分析： .....	31
2.2 贵屿拆解业的产业链分析.....	33
2.2.1 贵屿当地的拆解作坊类型和角色： .....	33
2.2.2 拆解产业链具体描述： .....	34
第三章 巨压和多方博弈下的贵屿发展 .....	41
3.1 各方势力的博弈.....	41
3.2 拆解行业发展趋势.....	44

3.3 小结与建议.....	45
附图 1 汕头市潮南区地图 .....	46
附图 2 贵屿镇简图.....	47

# 背景与前言

## 前 言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期和 90 年代初，广东贵屿镇开始涉及旧五金电器的拆解生意，由于获利丰厚，整个行业规模逐渐扩大。而就在此时，国外的电子废物通过深圳、广州和南海的转运点，开始大规模地进入贵屿。传统的收旧利废行业真正发展为贵屿人的主业：大面积的土地开始抛荒，贵屿镇区 80% 的家庭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并通过这个行业迅速积累财富。

然而，为了节省成本，贵屿的家庭作坊往往采用最直接和最原始的方式进行电子废物的拆解，在给贵屿镇居民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电子拆解行业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尤其对于空气、土壤和地下水：贵屿的空气已经非常的污浊，而饱受重离子污染的地下水更是早已不能饮用。

绿色和平还注意到电子垃圾给贵屿镇带来的危机不仅仅表现在环境污染方面，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发出了生存环境、自身健康方面所面临的严重恶果；同时，潜在在背后的则是不易察觉的民工劳动权益及保障问题、不公平贸易、企业责任等互相扣连的环境和社会公义问题。加上贵屿拆解的电子废物主要来源于美国、日本等国，贵屿的问题又超出了一般的环保问题而牵涉到国际贸易等相关问题，其中就包括原本就备受争议的国际贸易道德问题。这个问题还和电器产业整体的环保问题相关联。这种牵扯使得贵屿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然而，电子废物带给贵屿的环境灾害，在本世纪初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而且很快就把原本不为人所知的贵屿推向了世界关注的前台。同时，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及中央的重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要有比较系统，完善的方法和手段去推动这个问题的改变，仍然是很困难的。在大量国内外媒体的频频曝光之下，政府迫于媒体舆论的压力之下，开始对这个行业进行打击和整顿，从而导致这一问题：

- 当地的贸易和处理电子废物行业：由公开转为地下
- 当地人与民工及外界的关系：由简单转为复杂
- 当地人与民工对这个危害的意识：由原来的无知转为固执
- 当地人，民工，政府官员对这个问题变得尤其的敏感
- 进口的渠道和处理行业也开始蔓延到其他地区
- NGO，科研机构在开展研究和正面工作时难度也变大了

基于此，绿色和平在国内积极开展电子废物项目，致力于寻找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消减电子废物的跨境传播和污染。为了更好的了解贵屿的社会关系，产业结构，贸易关系等复杂的社会背景。绿色和平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共同对贵屿的当地居民和外来民工进行访谈，希望通过了解民工的生活状况、家庭史、群居结构、社会组织及其健康状况，与贵屿受影响群体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和评估，了解不同群体对电子垃圾回收和可持续发展的认知。

本报告首先阐述有关贵屿的生活：即本地人和外地人生活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他们从事不同层次的工作，在不同层次的地方消费，有各自的聚居地，彼此不相往来，互不信任甚至互相怀有敌意。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构成了两个世界。贵屿本地人和外来人的这种状态，人类学家周大鸣称之为“二元社区”。

其次，报告也透过接触当地民工及当地居民，重点阐述了贵屿的生产与组织。贵屿镇的拆解业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卷入了当地 80% 的家庭，成为贵屿支柱产业和当地居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贵屿电子业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和其宗族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后，报告透过调查和研究，提出了贵屿的发展问题。报告指出：容忍和鼓励贵屿的拆解业在当地的完善和升级，发挥当地的拆解业产业积累，并将其对国外的原料依赖转变为对国内的电子垃圾进行拆解，帮助贵屿建立起真正环保有效的拆解业体系，并抢占国内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先机，然后，在此基础上，鼓励当地进行产业多元化，将那些不可能进行环保化电子垃圾拆解的家庭作坊转向其他污染较小的行业，比如南阳正在尝试的服装业，将是一个比单纯打压当地现有拆解业更加实际而有价值的做法。

贵屿镇作为中国最大，最密集的一个电子废物贸易，处理集散地，从环境污染，健康受损，不公平贸易，劳工权益及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都是非常典型及有意义的一个推动工作。鉴于此点的考虑，绿色和平组织提前编辑出版了这本报告。随后，我们将继续对贵屿的健康和环境做综合的质量现状评估。希望能够全面的了解和掌握电子废物对环境，健康及人群的影响，从而，提出科学的建设性意见和改进方案。

此报告可供国内有关政府管理官员、法规起草人员、科学研究人员、商业机构及有兴趣的公众阅读和参考。因时间仓促，校对和印刷工作如有不妥之处，还望谅解！

绿色和平项目主任 赖芸  
绿色和平项目总监 卢思骋

2003 年 11 月 20 日于广州

## 调查的缘起

2003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们坐在颠簸的三轮载客摩托车里在各条街道上穿行，不断出现的装满各种各样电器的车辆，道路两旁大量的正在拆解各种电器、电路板、塑料及其他各种东西的家庭作坊，以及空气中不时传来的刺鼻气味，一再提醒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著名的电子垃圾拆解基地——贵屿。

贵屿的确是著名的电子垃圾拆解基地。它每年要吞吐掉上百万吨的电子垃圾（大部分源于进口），在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各种各样的可利用资源的大量回收的同时，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引起世界性的关注<sup>(1)</sup>。然而，对贵屿人来说，某种程度上却又是他们能够得到的相对较好的结果。

贵屿位于汕头市潮南区，占地面积52.4平方公里，下辖四个片区28个村（居），15万常住人口。贵屿地处潮阳市、普宁市和揭阳市的交界处，在2003年3月潮阳市被重新划入汕头市以前，三市对这里的管理互相推诿，结果导致贵屿成为典型的“三不管”地带。不过，对贵屿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于贵屿镇处于粤东练江的西岸，同时又处于一片低洼地的中央地带，这种地形使得贵屿成为严重的内涝区，农业生产基本没有保障。建国以前，由于当地地理的优势，贵屿开挖了发达的水上通道，成为潮汕地区的水路枢纽之一，这也是“贵屿”名称的由来。水路的发达给贵屿人提供了很多农业以外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但在建国以后，随着公路的扩建和水路的废弃，贵屿人在这方面的优势和机会就完全失去了。

面对如此沉重的生存压力，而在潮汕地区严重“人多地少”的情况下，迁移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发挥潮汕人的经商传统。贵屿人的选择是：收购废旧品。贵屿镇的农民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开始在临近的地区走村串巷，收购鸡毛、鸭毛、废旧铜铁等等，进行各种各样的废旧品收购，并且逐渐形成为当地另一种意义上的主业。到上个世纪80年代，贵屿人从事废旧物品的收购人数之多使得贵屿在潮汕地区非常著名。所以说到贵屿人，潮汕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收破烂的”。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贵屿开始涉足旧五金电器的拆解生意，并且由于获利丰厚使得整个行业规模逐渐扩大，传统的收旧利废行业在90年代初真正发展成为贵屿人的主业：大面积的土地开始抛荒，贵屿镇区有80%的家庭参与到这个行业中来，并通过这个行业迅速积累财富。而就在此时，国外的电子垃圾通过深圳、广州和南海的转运点，开始大规模地进入贵屿。

电子垃圾中含有非常多的有害物质，在回收处理过程中可能导致严重的污染，因而电子垃圾的回收与拆解一直是国际性的难题。但是贵屿的电子垃圾拆解业大部分是由家庭作坊来进行，这些作坊通常没有必要的设备和相应的技术，更没有充足的资金来降低污染。为了节省成本，家庭作坊往往采用最原始直接的方式进行电子垃圾的拆解，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严重的污染——尤其对土壤和地下水。这些污染在本世纪初引起了香港媒体的注意，并很快就将原本不为人所知的贵屿推向了世界关注的前台。

但是，如果仅仅是污染问题，贵屿还不至于受到这么强烈的关注。关键在于目前贵屿拆解的电子垃圾主要来源于美日等国，这就牵涉到国际贸易的相关问题，其中包括原本就备受

争议的国际贸易道德问题。同时，这个问题又和电器产业整体的环保问题相关联。这种牵扯使得贵屿的问题更加复杂。

贵屿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关注，这次调查也源于绿色和平希望进一步了解贵屿当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生活状态的愿望。8月初，绿色和平组织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达成合作意向，请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研究人员到贵屿进行人类学调查；8月上旬，调查组的两位成员先期来到贵屿，对贵屿镇的相关情况做了一个简单评估；8月中旬，调查组全部成员到达贵屿，开始对贵屿镇——这个著名的“垃圾之城”——进行为期两周的调查活动。

## 调查目的

如上所述，这次调查源于绿色和平组织进一步了解当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的愿望。在这个“垃圾之城”中，在这个环境受到严重影响同时又非常富庶的小镇里，人们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进行生产和生活，他们将面对一个怎么样的未来？这本身就是一个让人无法回避、无法安睡的问题。

在调查组出发之前，绿色和平组织与中大人类学系的研究人员设定了三个调查目标。首先，希望通过和本地人、外地人各 30 个个案的深入访谈，了解贵屿镇本外地居民的生活状态；其次，试图通过实地的调查与走访，了解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的生产状况和组织方式；最后，调查小组希望通过了解当地普通人和当地政府对贵屿发展的看法，来试着探讨贵屿未来发展的种种可能性。

于是，带着以上三个问题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6 名研究人员开始了他们在贵屿的两周的生活。

# 第一章 生活在贵屿

## 贵屿第一印象

贵屿是一个富庶的小镇。贵屿镇辖区内，处处可以看见成片的新建楼房，成片新建的传统潮汕地区“下山虎”的房子（造价非常昂贵），以及成片被遗弃的旧“下山虎”。路上随处可见挂着本地车牌的各种进口轿车，几条主街道在繁华程度不亚于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小镇，颇具规模的几家超市则显示了贵屿人的购买力。而本地比广州还高的物价水平一方面说明了物品供应链的拉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贵屿人的经济收入水平。

和邻近的广汕公路旁的和平、峡山和陈店相比，远离公路的贵屿规模要略小些，繁华的程度（尤其和当地服装业重镇峡山相比）也略低。但是如果和更加远离公路的谷饶、金玉等镇相比，贵屿无疑是个富庶而且发达的大镇。（见附图 1）

贵屿的经济实力还和家家户户的家庭作坊相关联。无论是在镇区的中心市场地带，还是在偏僻的村庄，无论是拔地而起的楼房，还是路边简单搭建窝棚，都可以看见屋里屋外堆满各种各样的废旧电器、塑料，到处是忙忙碌碌的工人。这样的家庭作坊在贵屿成千上万，构成了贵屿经济的主力。

然而，贵屿也是一个生活极不便的地方。初到贵屿，第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适应当地的空气。在那里，我们经常被突然袭来的刺鼻气味弄得呼吸急促，同时我们还不得不饮用瓶装矿泉水。因为当地除了南阳片区，绝大部分的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都已经不能饮用，而整个贵屿，也只有龙港的部分地区通了自来水。当地的景观之一就是能不时看见跑来跑去的卖水车，这些水从 9 公里外的陈店运过来，马上从 1.5 元/吨变成 1-2 元/桶（40 升左右）。运水业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行业之一，为数以百计的运水车主提供了就业机会。所以，我们在当地的吃饭问题也成了一个困扰人的事：对店家是否真的是买干净水来烹饪还是就地直接使用地下水的猜测通常使得我们的胃口大减。

由于每天大量涌入的电子垃圾，贵屿镇的生活环境变得非常糟糕。作为当年的水路枢纽，贵屿境内各地至今还留有大量的河涌，但是这些数以百计的河涌现在无一例外都成为了臭水沟。由于大量倾倒各种电子垃圾拆解后的各种余料和废件，前几年的河水都变成了黑色，只是这两年经过治理才渐渐转变为变成深绿色，散发出的气味也要淡一些。大街上四处可见成堆的电子垃圾和经常堵在街道上正在卸货的大型汽车，使得街道看起来比较脏乱。如果走到镇区和村区之外，那些被抛荒的田地大部分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这些垃圾堆放点经常冒出滚滚的黑烟，如果刚好走在附近，刺鼻的令人作呕的气味和遮天蔽日的滚滚黑烟，着实让人吃惊。

贵屿还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地方。当地长达十几年的“三不管”的经历，强大的宗族势力，还有由于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数以万计的流动人口，以及由此出现的本外地人矛盾，使得贵屿成为一个不安全的地区。当地各种宗族势力在历史上就冲突不断，村与村之间的械斗至今仍然常见，这样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村民们“以暴力解决问题”的思路成为某种定势。而贵屿镇派出所的警员只有 12 名，以此区区警力面对如此众多而民风强悍的当地居民，其结果可想而知：很多情况下，大型的村民闹事事件往往源于公安派出所对当地某些人士的拘捕。同时 90 年代中期以来，大量的外地人流入贵屿寻找经济机会。外地人在为当地提供大量极其低廉的劳动力的同时，由于当地的三不管状态和强悍的民风，也引发了很多治安问题。本外地人的关系因此而迅速恶化，形成一种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没有信任感的关系。这种关系，连同本来就互相不信任的本地人关系，使得贵屿成为一个的确没有安全感的地方。

于是，富庶，遍地的电子垃圾和作坊，糟糕的环境和缺乏安全感的生活，构成了我们对贵屿的初步印象。

## 贵屿——两个世界的生活方式

只要在贵屿的时间呆得稍长的人，都可以明显地觉察到本地人和外地人生活在不同的两个世界中。他们从事不同层次的工作，在不同层次的地方消费，有各自的聚居地，彼此不相往来，互不信任甚至互相怀有敌意。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构成了两个世界。贵屿本地人和外来人的这种状态，人类学家周大鸣称之为“二元社区”<sup>(2)</sup>。

在我们访问的 42 例本地人和 47 例的外地人中，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职业极少交叉。本地人大部分是工厂主、作坊主、小生意经营者，而外来人口的主要工作内容则是电子垃圾拆解、搬运、三轮车拉货或载客，和极小部分的小生意经营。他们之间重合的部分只是“小生意经营”（见表 1、表 2）。而他们的收入差异自然也非常明显。

由于从事职业的差别和由此带来的收入上的差距，本地人和外地人在消费习惯上有极大的差异。当地一位知名人士这样评价本地人的消费习惯：“他们不会在意价钱，也不会在意用得上用不上，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就要买下来。”在贵屿的规模较大而档次较高的超市里和饭店里，拥挤的顾客群里大多数是本地人。外来人有不同的消费方式。当我们要求载客三轮车帮我们找个地方吃饭时，如果我们没有特别说明，他们会很自然地把我们拉到那些看起来很不卫生、消费非常低的小店铺：很明

**表 1：受访本地人职业分布**

本地人职业	人数	比例
工厂主	8	20%
作坊主	17	40%
小经营者	8	20%
其他	9	20%
合计	42	100%

**表 2：受访外地人职业分布**

外地人职业	人数	比例
进工厂、作坊务工	18	35%
搬运	8	15%
三轮货运	5	10%
三轮客运	5	10%
小经营	5	10%
其他	6	10%
合计	47	100%

显，这才是他们一般常去的地方。甚至这样的小店也不是他们能够光顾得起的，一般一个 2 元钱或更加便宜的盒饭，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够好的了。经过多次试验都有这样的结果之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不得不在每次吃饭前都指定地点，或者说明要到什么类型的饭店去。

潮汕人都有聚居的习惯，贵屿人也不例外。在当地我们总是可以看见成片的几十甚至上百座新盖的楼房，或者新建的潮汕的“下山虎”风格的房子<sup>(3)</sup>，以及较为破旧的“下山虎”的房子。那些新建的“下山虎”一般住的是当地的老人——他们住惯了这种老房子，而当地新发达起来的中青年人喜欢住新建楼房。那些破旧的老屋，则多数出租给外地人居住。只有在本社区内，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比较多。在除了工作和生意之外的多数情况下，外地人社区和本地人社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接触。

不过，就算在杂居——这在华美老市场中非常多见——情况下，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敌意也阻碍了他们之间的交往。在我们的访谈中，几乎每一个外地人都提到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敌意、歧视和暴力行为，评价当地人最常用的词语是“素质低”、“法律意识低”。大部分外地人都提到本地人随意打骂、歧视和敲诈外地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案例经过多方求证，证明确实发生过：在 2001 年，就在贵屿镇政府旁边的华美新街上，有三位外地人（二男一女）被怀疑为偷摩托车，被华美的本地居民围住当街打死。其中有多来自不同地方、互不相识的外来人发誓说亲眼看见一个在华美新街居住的老人，在那 3 个外来人被打死后，跳到他们的背上去踩。当地联防队和派出所在这个过程中根本就无法控制局面。

而本地人对外地人的评价同样非常差。在贵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几乎家家都养有那种看门的大狗（而非那些富庶地区常见的宠物狗）。在新建的楼房中，尤其在龙港的新建楼房中，很多人家都装有闭路电视监视器。受访的本地人经常投诉说外地人的到来恶化了当地的治安，指责外地人小偷小摸，甚至入户抢劫。老一辈的人常常回想起 80 年代时“夜不闭户”的情况，而对现在贵屿的治安状况表示不满和担忧。

然而，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在实际上又相互依赖。本地人从电子垃圾拆解业中获得厚利的同时，深知拆解电器对身心可能造成的伤害，因此，极少本地人愿意参与到具体的拆解工作去，除了简单清洗塑料这样一些的确轻松而又没有伤害的简单工作。具体拆解的工作几乎全部由外来人承担，本地人因此付给外来人一份微薄的工资，这成了外来工在当地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和拆解业相关的几乎所有的体力工作，比如转运、装卸货物，也几乎全由外来人来承担。因而电子拆解业在贵屿的兴旺和本地人的“寄生性”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吸引了大量的外地人。而这些人员的聚集又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市场，给那些从事小生意经营的外来人提供了市场空间和经营机会。

于是，这样两个生活在同一地点而又互相隔离的世界构成了贵屿目前生活的两大部分：本地人世界和外来人世界。这两个世界人们相互隔阂，又相互依赖：这就是贵屿人“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

## 富足、传统、压力与惶惑：本地人的生活

### 富足的经济生活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贵屿已经绝对是一个“非农社会”。在贵屿，早在 90 年代初，远在本地水质遭受严重污染之前，土地就已经开始大面积抛荒。在 8 月上旬的试访的过程中，在贵屿镇的范围内，极少看见人工栽种的农作物。当我们因为看见成片的抛荒的土地而诧异地询问时，得到的答案是往往是“现在本地人谁还去种地啊！”。不种地的原因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这里是内涝区，收成没有保障，但是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务农根本就不可能让当地人发家致富。因此，本地劳动力很自然地转移到收入极高的电子垃圾拆解业上。

在贵屿的四个片区中，贵屿镇区、上练和港后片区 80% 以上的本地居民以电子垃圾拆解业为生，南阳片区由于开展的时间偏晚，参与的程度略低，但也有超过 50% 的本地居民从事和电子垃圾相关的生意<sup>(4)</sup>。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每年贵屿镇回收处理的电子垃圾在百万吨级以上。有几个关键性的数据可以说明问题：该镇每年回收的塑料在 15 万吨以上，回收铁、铝、铜、锡等常用金属 20 万吨以上<sup>(5)</sup>。这样大规模的回收，在当地又缺乏真正上规模的工厂的情况下，需要普通作坊的参与量可以想见。

电子垃圾拆解业给当地人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在调查中，我们遇见一位南阳的从事电器拆解的郭老板。他在 1994 年左右开始进入这个行业，刚开始时，郭老板住的是普通的下山虎的老房子，骑的是一辆电动自行车。两年后，他就买了摩托，再过两年，建了两栋 3 个门面的 6 层高的楼房，还有两辆小车。在贵屿，郭老板只是数以百计的例子中普通的一个。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成片的新建楼房，当地富庶的另外一个明显标志是当地的学校和公共活动场所。贵屿镇辖区有四个中学，10 多所小学，除了初建时间相对较早的贵屿中学，其他 3 个中学和所有的小学都建得非常漂亮：大面积的占地，漂亮的教学楼和办公楼，甚至还有漂亮的图书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村级和镇级的中小学完全可以称得上“豪华”。由于所有这些中小学都是当地财政和乡民集资而建，当地的富庶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拆解业，当地的第三产业也非常发达。在镇区，高中低档的饭店、酒店一应俱全，生意虽然比前两年有所不如，但是仍然非常好。在几条主要的街道上，各种店铺互相连接，从早上 7 点多陆续开门，一直营业到晚上 10 点多。4 家颇具规模的超市各据一处，位置非常合理，生意兴隆。就算是偏僻的小街巷甚至在镇区之外的村里，各种各样的店铺仍然非常多见。当地娱乐业和色情业也非常发达，稍微上档次的饭店和酒店，所有的餐厅都是一个一个的卡拉 OK 包房，里面的众多的妙龄小姐穿梭来往。一到晚上，这些地方的门口往往停了大量的摩托车和汽车。而在当地的发廊，多数情况下是小小的门脸里面坐着 10 几个年轻小姐在等待着客人<sup>(6)</sup>。

本地人的消费习惯也很有代表性，和许多迅速致富的地区一样，当地人消费习惯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sup>(7)</sup>。在我们的入户访谈中，可以看见当地人豪华的楼房里面豪华的装修，名牌的家用电器（多数为进口，而且明显不是二手回收货），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摆阔”

的行为。本地老板几乎都吸烟，最差的烟也是 20 多元一包的“芙蓉”，稍有身份的商人，几乎清一色抽 3、40 元一包的“中华”。在前几年，贵屿的拆解业还处于自由发展的时候，本地人的消费习惯更加随意，“那个时候真是好赚钱。你看这个三轮车，那时候从贵屿到龙港，要 25 块钱一趟。本地人从不讲价。现在呢？5 块钱！”。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当地人说的：当地人买东西，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就要买下来。这种消费习惯使得本地的物价至今仍然要高于广州。

然而，和其他地方一样，贵屿也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当地，还有一部分当地人非常贫穷，他们是那些没有参与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农民。由于内涝区本身环境的影响，更由于电子垃圾拆解对当地水质的污染，这些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耕种。但是，当地这些不再耕种的“农民”，一方面没有本足够的资本投资到拆解业中去，另一方面，由于在作坊里打工的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因此他们也决不愿意“自掉身价”去打工。很多这样的贫穷的本地人家庭甚至不能供孩子们上学。这些不适应的农民是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电子垃圾拆解业双重的牺牲品。

## 富足的背后——拆解业的负面影响

电子垃圾拆解业需要很高的投入来控制对当地的污染问题，但是以作坊生产为主的贵屿根本就不可能配备那些昂贵的设备。在中国，就算是一些国家级的大型企业都对污染处理问题带来的费用感到难以承受，这些小家庭作坊自然也就更加不可能承受。为了节省成本，这些作坊采用最原始的方式进行生产，并用最简单的遗弃方式处理已经没有回收价值的那些废品：这样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环境的高度污染。

首当其冲的是贵屿镇大大小小的河涌。这些见证了贵屿作为上个世纪前半叶潮汕地区的水路枢纽的大小河涌，在贵屿电子垃圾拆解时代成了最好的垃圾倾倒堆放坑。已经没有回收价值的废旧电路板，被去掉了所有塑料、金属部件和电子元件的显示器的显象管，各种边角塑料，甚至提取各种残余金属之后的没有使用价值的强酸，以及生活垃圾，在 90 年代时期大量倒入这些河涌之中。这些河涌很快就成了重金属严重超标的臭水塘<sup>(8)</sup>，并迅速进一步污染土地和浅层地下水。还在 90 年代中期，除了河涌相对较少的南阳，贵屿镇镇区、上练片区和港后片区的地下水已经完全不能饮用，这里的居民那时就已经面临着买水的窘境<sup>(9)</sup>。在 2001 年贵屿镇电子垃圾拆解业被曝光之后，政府开始整治河涌，严禁乱倒污水和垃圾，并开始疏通河水。但是至今，大部分河涌还是呈现墨绿色，继续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并继续污染着土地和地下水。

由于水源受到污染，而买水毕竟是需要成本，因此他们还是会使用地下水用来洗涤生活用品和用具，有时甚至包括清洗餐具，导致的非直接饮用和污染。而运水的过程也存在着诸多不可控的环节，因此，当地人因为饮水而引发的健康问题非常多。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肾结石。我们访谈过的所有的医生，几乎都把肾结石列为当地最为常见的疾病之一。

河水的污染，不仅使当地人失去了方便的饮用水的来源，还使他们生活环境受到严重的影响。有些年纪的当地人都能回想起当时河涌水清时贵屿的风光和景色，有一个当地干部甚至还很动情地说起他们小时在河涌边玩耍的故事。而现在，他们只能面对这样一条条散发出难闻气味、充满重金属的河涌。然而，失去了玩耍乐园的贵屿当地的孩子们未必明白这

一点：我们在当地的调查过程中，有 4 次看见当地的小孩就在这些墨绿色的、肮脏而危险的河涌里面游泳，怎么劝都不肯上来。

贵屿的空气也是受到当地人诟病的第二大方面。贵屿镇地处低洼之地，周边都是丘陵地区。在整个贵屿范围因为烘烤电路板、焚烧垃圾和塑料回收生产等产生的大量有害气体和悬浮物，很难通过空气的自然流动而散去。因而，在整个贵屿地区，空气的质量非常差。每天，我们从驻地陈店镇前往贵屿的时候，能够很清晰地辨别出空气质量在一点点的变化，最后到了贵屿的时候，尤其是镇区的北林村和上练片区，空气就会变得非常的浑浊。

由于空气污染而导致的呼吸道疾病是当地人常发病之一。一般医生都把呼吸道疾病放在感冒之后，和肾结石并列为当地第二大常见疾病。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由于抵抗力较弱，那些年纪尚小的儿童是呼吸道疾病最大的受害人群之一。

在贵屿，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大量抛荒的土地。在华里西、贵屿和南阳之间的路旁以及龙港村路旁那些成百亩的抛荒的土地，有些已经长满了荒草，看上去已经起码有好几年没有耕种过了。而我们调查的结果是，除了在龙港东部以及南阳乡等地还有少量的稻田依旧在耕种外，整个贵屿的其他稻田都基本上被抛荒，或者给当地人用来做了厂房、仓库或者垃圾堆放地。只有从贵屿到南阳的路上左面的几百亩的稻田有些让人意外。在我们的预调查的时候，从贵屿到南阳的路上左右两面几百亩的稻田明显都已经抛荒多年，右面的稻田有一部分被用来做了一个养鸭场，但是左面的稻田全是荒草一片。然而 5 天之后，在我们的正式调查的期间，我们发现左面的几百亩稻田中，靠近路边的几十亩都已经重新耕开并插上了秧苗。当我们惊奇地询问原因时，才知道在我们预调查走后的几天里，国务院六个部委连同汕头市市政府来到本地检查，这些稻田就是那时给赶种上的。

但是，当地人对于稻田被补种上并没有什么积极的评价。一方面，富庶的当地人早已经不愿意再种地了。在贵屿，有些“自重身份”的当地人，哪怕非常穷，却也不愿意再种地。另一方面，当地的土地和水质除了南阳之外，已经受到严重污染，种出来的粮食他们自己都不敢吃，只能拉到外地去卖给那些不知情的人。

于是，电子拆解业就这样再给当地人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的同时，几乎完全地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环境，进而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

## 传统与现代——传统价值观念对贵屿人影响

和本地经济的增长相对应的是当地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刻意维系和保留。在贵屿当地，最漂亮的建筑有三类：学校，老年活动中心和宗祠。学校是为了教育子女，老年活动中心是为了赡养老人，宗祠则是拜祖先的场所，这三者历来是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今天的“老年活动中心”在传统乡村社会一般未必会有专门相对应的建筑）。这三者在当地

---

通过与当地医生的访谈获得这一信息。同时，2002 年 3 月 10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在其“贵屿镇的 100 万吨“高科技垃圾”的报道中，曾报道说“当地卫生院对其中一条村全村学生的身体检查结果显示，80% 以上的中小学生患有呼吸道疾病，另有 5 个学生则被证实患了血癌。”绿色和平组织工作人员在 2003 年 6 月的独立调查也得出了类似结论。

的受到的重视程度表明传统的“爱幼、尊老和宗族观念”的典型传统价值观念依然在当地起着重要作用。

在今天贵屿划分的四个行政片区，每个片区都有 2-3 所小学，3 所以上的幼儿园，同时每一个片区都有一个中学。一般在一个片区，看见有围墙的一个大型院子，和几座漂亮大楼，就知道肯定是当地的学校。其中，龙港的中学，渡头村的小学，华美的小学和南阳片区的小学都建设的非常豪华漂亮，远胜许多城市里的中学和小学。而龙港和南阳的老年活动中心是当地老年活动中心比较突出的：占地上千平方米的三层楼房，以及一个精致小花园。在四个片区随处可见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宗祠，则是宗族势力和祖先崇拜的典型体现。其中，规模宏大的南阳乡郭氏宗祠，北林村陈氏宗祠，渡头村马氏宗祠和龙港村彭氏宗祠，以及每个片区各有一个的豪华“老爷”庙，是当地宗祠的典型代表。

贵屿当地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生活中的体现还在于其生育抚养观念：贵屿本地人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的“多子多福”的观念。超生在贵屿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更由于以往本地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对计划生育的控制非常薄弱，因此在我们的访谈中发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2 个以上的孩子，拥有 7 个、8 个甚至 10 个以上孩子的家庭也并不鲜见。潮汕人对子女数量的传统要求在贵屿这个特定的地区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传统观念保留比较完整的情况下，传统的乡村社会的社会组织——宗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宗族势力与权力结构——贵屿生活的权力背景

宗族势力在潮汕地区的遗留与复兴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贵屿表现得尤为明显。

贵屿镇本地居民的居住方式非常具有潮汕特点：同姓聚族而居。在贵屿，一般一个村就是一个姓，比如渡头村姓马，上彭村、龙港村姓彭，北林村主要姓陈，而整个南阳乡都姓郭。每一个姓就是一个宗族，每一个村每一个姓都有各自的祠堂，同时一个片区的同姓宗族又会共建一个规模较大的祠堂，以便共同拜祭。而当地的宗族组织也非常发达完善，宗族的族长和其他核心成员在宗族内享有很高的声望和权威。于是，在这种同姓聚族而居的情况下，贵屿的宗族势力非常强大并且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祭祀：和多数潮汕人一样，贵屿人认为只有“拜好了‘老爷’，家里才能兴旺”。因此祭祀是贵屿当地最重要的活动。在我们的调查期间适逢农历 7 月“鬼节”期间，这是传统潮汕人祭祀的最重要的两个节日之一（另一个是春节）。祭祀的主要内容是以宗族的形式拜祭“老爷”（潮汕的“双忠公”崇拜）。8 月初我们进行试访时是农历 7 月初，在南阳和龙港等地我们发现很多当地都在搭潮戏台，问之原因，才知鬼节就要到了，历时半个月左右的大祭拜就要开始。8 月中旬一天中午，我们去南阳某地进行访谈，到了南阳市场地段，马上发现前面人山人海，几条主要通道完全堵塞：手拿各种祭香和祭纸参与拜祭的当地人，和来看热闹的外地人，各种占地摆摊的小贩，以及在路旁的各种祭祀的摆设堵住了道路。结果我们不得不退出，绕行 3 个多公里绕开这个地方才得以通过。但是就在我们绕行的那些比较偏僻的

小街巷，也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插香、挂各种神像符贴，满地都是鞭炮燃放之后的纸片。在去南阳之后的第二天，我们在龙港恰好遇见抬着“老爷”神像到各条主要街道去接受各位村民拜祭的游行队伍。“老爷”所到之处，家家燃放爆竹，每家都出来一人向“老爷”神像两手合什作揖。

我们在贵屿调查的前半期时间都属于“鬼节”期间，因此我们在几乎每一个村庄都可以看见村庄入口以及家家户户门口插的那种一人多高的“大香”。这种大香是潮汕地区特有的拜祭“老爷”时候用的祭香，价格非常昂贵，便宜的一支也要几十元，贵得要一两百元一支。因此一次拜祭尤其是“鬼节”和“春节”的大拜祭花费很大，殷实一点的人家光是买香都要花去几千元。正如当地人所描述的，“拜‘老爷’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在拜‘老爷’时，生意可以不做，事情可以不做，但是‘老爷’不能不拜。”“很多经济情况稍差一些的家庭，会把半年一年的辛苦收入积累起来，然后花在拜‘老爷’上。”当地祭祀之盛，可见一斑。

每次这种大型的需要非常细致的组织协调的祭祀活动，都是按“姓”进行、由宗族来组织。这种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的联系使得宗族和贵屿本地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祭祀牢牢联结在一起，从而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生产：在贵屿调查的初期，我们发现贵屿的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分布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域色彩：北林主要从事电路板拆解，而上练片区的龙港、渡头、仙马、仙彭等村是当地塑料回收和生产的主要地区，而传统最著名的电器拆解则是在南阳比较发达。在初期，我们以为这是经济学上的“集聚效应”的自然结果，后面经过深入的访谈和了解才发现，这种区域分布和宗族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贵屿，每个宗族都有对内互相帮助、对外一致团结对外的强烈倾向。在这种倾向下，同宗族的各个家庭在经济活动中，会自然而然地互相帮助，互相提供信息，甚至以合伙的形式进行经营活动。同时，对宗族外的人则相对保守秘密，甚至有意阻扰其他宗族的人从事同一生意，以避免竞争的加剧。这样的自然结果就是经济生产按照宗族为单位进行集聚，形成一块块非常明显的拆解业生产区域。

例如，在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发展的早期，还有很多关于争抢货源而发生宗族械斗的事情，主要发生在北林和其他村的村民之间，因为北林宗族的民风最为强悍。这也是为什么备受政府关注和严格控制的烤电路板作坊至今仍然能够大量聚集在北林村地段，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压制而消亡。而在最近3年左右才刚刚大规模发展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南阳，宗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南阳整个乡都是郭姓，郭氏宗族的势力非常强大，有着广泛的海外联系，甚至在文革期间南阳的宗族组织都没有被完全取缔。当地政府机构对于如此强大的宗族组织在很多情况下都感到无可奈何。于是宗族为南阳的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屏障，在其他地方的电子垃圾拆解都在衰退的情况下，南阳却在节节发展：南阳的发展过程恰恰是其他村庄因为政府和各方面的压力而逐渐衰落的过程。

政府部门在提到南阳的监管问题时，一再提到南阳的宗族组织是监管的一大障碍。如果政府以非常强硬的手段介入，强行禁止，那么“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情况出现”。例子之一是在2001年，潮阳市公安局派出人员到南阳去检查造假工厂，结果当地人得到消息之后，整个南阳都沸腾了。村民们堵住道路，砸毁了7辆警车。整个局面弄得无法收拾，结果只好

调来武警部队来控制局面。这是南阳宗族和政府机构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冲突。从此之后，所有涉及南阳的问题，有关机构都显得迟疑和审慎。而这种态度对于南阳拆解业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乡村权力：**宗族在贵屿全面的渗入使得宗族至今仍是乡村权力结构中的重要力量。在贵屿，镇政府 - 村委会 - 宗族势力 - 经济能人 - 知名文化人士构成了基本的权力结构。但是，除了在镇政府这一环节由于多数实行“异地为官”的政策，宗族无能为力之外，在村委会、经济能人这些领域，宗族的介入却非常深入。在贵屿，聚族而居的习惯使得每个村都只有一个大姓，而只有这个大姓的成员才有可能当选村长，也才有可能在该村担任村支书的角色。从各个片区和各个村的中学小学校长的委任情况来看，就算是相对权力较小的校长仍然在本地和宗族的势力有着关联。因为在本地学校的校长不是由本村的大宗族的人担任的情况下，上级一定会委派一位或者两位本地大宗族的人担任副校长以示平衡。而在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几乎所有的经济能人都和宗族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在贵屿最常见的情况是：最大的经济能人既是村支书，又是宗族里面的头面人物之一。比如华美村最大的老板就是当地的村支书，他经营着全贵屿最大的超市，最豪华的酒店，参股了当地著名的私立医院，同时还拥有当地最大的几家塑料回收加工厂。在宗族组织中，由于他的辈分不是最高，因此他不是族长，但是族长在进行宗族的相关活动时，总是要和他商量，争取他的支持。因而，透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见这些角色之间有着非常自然的联系。

在乡村权力结构中，唯一相对独立的是知名文化人士，他们很多独立与宗族之外，并对当地的电子垃圾拆解业持批评态度。但是这样的知名文化人士很多都因为各种原因迁离了当地，我们虽然做了几次追踪的尝试，但是遗憾的是都没有成功。

在 2003 年潮阳被重新纳入到汕头市区之前，贵屿一直是一个“三不管”的地带。乡村社会要维持有效的运转，需要一套有效的权力结构系统。在政府机构在某种程度上缺位的情况下，作为传统势力的宗族自然而然地就充当了当地有效运转的核心权力。有着长期历史文化积淀的宗族核心权力一旦建立，希望在短期内消除它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它必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介入乡村权力体系，并力图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在贵屿观察到的情况。

**政府：**贵屿的当地政府是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在以往的三不管的历史中，上级监管的缺位，使政府其实是完美地充当了“守夜人”的角色：基层和民间事务基本被当地宗族完成，政府只需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同时为当地拆解业提供土地、电力和其他方面的支持而不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的运行。由于本地的财政收入在 1990 年以后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来源于拆解业，当地政府还在可能的层次上尽力为拆解业的发展提供支持，这也是当地拆解业在 90 年代时能够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一切在 2001 年贵屿拆解业被香港媒体曝光之后发生了改变，政府被迫承担起整治拆解业和使引导贵屿产业转型的重任。但是，由于和宗族以及拆解业势力的长时间的合作与共处，贵屿政府机构在面临已经非常强大的拆解业产业势力和宗族势力时显得弱势而无力。由一个“弱政府、强宗族、强市场”的现有社会结构变成“强政府、弱宗族、强市场”的目标社会结构，在贵屿来说，明显还需要时日。

**村际关系：**宗族对村际关系的影响最为明显。几乎贵屿所有的村际关系紧张事件都和宗族有关。每次村际的械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基本上都是由宗族来组织。贵屿历史上的

村际关系非常紧张。在 80 年代及以前，由于农业用水的问题，贵屿镇华美村和北林村的村民每年都要和梅家村（现属陈店镇）的村民打架。现在同属贵屿镇上练片区的彭姓（仙马、龙港和上彭等村）和马姓（渡头、流仙等村）两个宗族，在 90 年代以前还经常械斗。就在我们离开当地的前一天，由于某种原因，上练片区还有两个村庄计划械斗。接到举报电话后，镇里几位主要干部一大清早火速下乡干预，到中午才将事件平息。

这种紧张的村级关系以及宗族在应付这种村际关系采用的暴力手法，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本地的民风非常强悍，以暴力解决问题成了当地人的某种思维定势。而暴力的使用在 90 年代前进一步恶化了村际关系，在 90 年代后又迅速恶化了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关系，并且至今仍然在阻扰着当地人法制观念的建立。

参与：不过，在贵屿可以明显观察到的一点是，本地人对于宗族的参与存在非常强的年龄分层现象。中老年人的参与热情明显要大大高于年轻人。无论是在大型的祭祀活动中，还是在村际械斗事件中，参与的年轻人远远要少于中年人和老年人。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大多数 20 岁以下的年轻人对于宗族的相关知识非常陌生，对参与宗族活动也缺乏热情。这可以说明宗族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在减弱。但是据此做出“宗族正在消亡中”的结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极有可能这批年轻人在将来的教化过程中被逐渐吸纳进入宗族的习惯思维和习惯行为之中。

## 子女抚养与教育——“贵屿人”的构建和塑造方式

每次经过贵屿兴建的那些漂亮的学校时，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起“潮汕人对子女抚养和教育非常重视”这么一个传统的论断。的确，很多家长都表示将全力支持子女的学校教育。但是，在贵屿，家长们对于教育的重视还有一个额外的理由，那就是环境问题。大部分受访的本地人都明确表示不希望子女承继父业，而是希望他们能够读好书，考上大学，离开贵屿，表示只要孩子能够读下去，就乐意提供学费和其他方面的支持。

然而，当地的一个关于子女教育的一个悖论是：一方面这几年汕头市的高考状元都出自贵屿，另一方面是贵屿的大部分的年轻人没有读到高中，而是在小学毕业或者初中毕业就开始帮家里做生意。他们受到的是另外一种教育：基于潮汕文化传统的“社会教育”。这种教育的优秀“毕业生”——很多当地老板甚至以自己没有高学历但是生意上却很成功为荣。有些老板公开说：“我小学没有毕业，但是我照样赚钱。你高中毕业，还不是照样给我打工。”

由于接受的现代教育较少，而当地的宗族势力又得到了相当的保留，贵屿本地人一些行为模式带有强烈的传统乡村社会色彩而缺乏必要的法律观念。除了以暴力解决冲突的思维定势，对外来人的不尊重、任意打骂，以及对所雇员工的野蛮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此有关。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现象在贵屿将继续存在。而上述的教育方面悖论的存在，毫无疑问，还需要为这种现象的延续而继续负责。

## 从这个世界看另一个世界——与外地人的关系

在贵屿，数以十万计的外来工活跃在工厂、作坊、服务业，活跃在贵屿镇的每一个角落。正如在前面多次提到的，本地拆解业是建立在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的。外地劳动力以其低廉的价格，对劳动和社会保障的低要求而为当地老板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并以他们对致富的强烈渴望和经商的本能为当地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服务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外来工这一角色的加入造就了今日的贵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外地人融洽的关系。

在我们的访谈中，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最典型的两种态度一是“轻视”，二是“敌意”。老板们认为外来工只不过是外地来的穷农民，为了几个钱而来到本地干苦力，他们干了活，我给了他们钱，那么我的义务就尽了。在我们的访谈中，除了一些教育界人士和一些从事其他经营的小业主，很少遇见能够认同“外来工为本地作出了贡献”的说法的拆解业老板，在他们眼里，外来工就是一群来当地想方设法赚钱的穷人，赚不了钱就小偷小摸。

“外地人小偷小摸”，他们的到来恶化了当地的治安，这是贵屿当地人的普遍看法。在我们和政府部门的访谈中，一位政府官员非常担忧地谈到这一点，认为这是本外地人关系的一个死结所在。的确，由于贵屿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管体系，外地人来到本地之后是有些损害当地人利益的行为，比如偷、抢摩托车的事情很多就是外地人所为，甚至有很多全国通缉的罪犯因为本地管理松弛而躲避在这里。但是如果据此而把外地人全部视为小偷小摸或不法分子而加以敌视，这就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进一步恶化本外地人的关系。

## 惶惑的未来——压力之下的未来期望

每次我们走在贵屿街头，看着贵屿繁华的、表面上和其他小镇没有差异的街道，我们经常会忘了这是一个世界闻名的电子垃圾拆解中心。然而，不时穿过街道的一车车电器和塑料，街边忙碌的拆解作坊，空气中不时飘来的刺鼻的气味，以及在每次吃饭前的令人胃口大减的猜测，又一再提醒我们这里是贵屿。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这个忙碌、繁华的小镇究竟是在哪里出了问题？

每次我们和本地人谈到当地的环境问题时，本地人要么以各种理由来否认污染的存在，要么以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回避这个问题，或者力图使回答既在政治上显得正确，又符合当地人的利益。不过，非常清晰的一点是，他们对于污染的存在和严重性心里有数，但是他们选择了否认、回避或者沉默。只有在问及子女的将来的时候，多数人的态度才明朗起来，那就是最好子女能够离开贵屿，离开这个饱受污染的地方。

这就是贵屿人的一种典型的心态。每一个人都知道污染的存在，但是他们需要钱，需要收入的增长。一些贵屿人含蓄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大家都是做这个的，靠这个吃饭，（有污染）那也没有办法。”他们不愿意再重复当年在内涝区辛苦耕种时的贫穷，也不愿意重复当年走村串巷时的艰辛，而他们又无法否认这个行业的污染性。

外界的关注给当地人造成了很大压力。频繁的新闻曝光，国际的关注，以及国家部委的直接干预，使当地政府和当地居民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之中。每次我们走在街上，都会看到当地人狐疑的眼光，我们在贵屿的向导经常接到询问我们的身份的电话。有两次我们访谈结束离开后，马上来了两批的当地人前来询问我们访谈的内容和动机。在我们和当地人访谈的时候，每次拍照留念的要求都引起当地人很大的困扰——他们非常不愿意面对相机，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放弃。甚至我们访谈的中小学生都显得谨慎而迟疑：他们的家长大多数都从事相关的行业，他们不知道怎样的表达才能既不伤害家人的利益，又能够不违背他们所受的教育中的“做人的标准”。以至于很多的访谈，无论对于我们这些访谈者还是对于当地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还有更多事情折磨着当地人。经济收入的增加带来了很多本地人意料之外的东西：毒品、色情业、赌博和六合彩。毒品吸食者是如此的众多，这已经成为当地派出所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但是当地区区 10 几人的警力和本身就不规范的治安联防队，面对这样的问题显得非常的无奈。赌博和六合彩本来就是整个潮汕地区的一个严重问题，而贵屿尤甚：在某种程度上，六合彩在贵屿是全民参与。在我们刚去贵屿头几天，就发生了一个当地村民因为参与六合彩严重亏本之后自杀的事件。更为离奇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死者全村的六合彩民使用这位死者下葬的日期作为买六合彩的号码，结果据说全村皆中。经过我们和当地管理部门有关人员私下求证，说明这件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的自杀事件确有其事，而当地六合彩的参与度也的确要超出外人的想象。而色情业的后果之一，就是在我们和所有的医生访谈中，在问及当地的最常见的疾病时，性病排在前 4 位：只有感冒、肾结石和呼吸道疾病能够排在它的前面。每次和年长的当地人，政府官员，以及当地文化人士谈及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无不显得有些黯然。

然而对于当地人来说，更为直接和明显的是：没有人愿意回到过去。内涝区这种独特的地形使得贵屿就算时至今日没有受到任何污染，依然不适合进行农业生产。而且，在当地人看来，农业生产绝对是一件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的亏本买卖。每次他们说起以往的农作的艰辛，和走村串巷去收旧废品的辛苦日子，他们总是摇头不已。

于是，在贵屿，未来成为最不确定的一件事情。每一个人谈及贵屿的未来都显得有些无奈而沉默。放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不可能，而坚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坚守的表面上最有意义的结果——富足，对于当地人来说究竟带来的是什么，很多当地人也感觉说不清楚。每一次和当地人的深入交谈，我们都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在表面上的确信背后潜藏的惶惑的不确定的感觉。

## 另一种的客家：外地人的生活

### 聚族而居的“新客家”——在贵屿的外地人

在贵屿，到处都可以看见外来人。他们在工厂、作坊里面做拆解，在饭店、商店里作服务员，在大街小巷里做载客三轮车夫，在各个货运点搬运工和三轮载货车夫，在各个集市里摆摊做些小买卖，开店做些小经营，以及在各个娱乐场所里做三陪小姐……

贵屿的外地人究竟有多少，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弄清楚。外来人自己的说法是有 10 多万，本地人也说应该已经超过了本地人（本地人口 15 万），但是官方正式的数字虽然经过多次努力却一直未能获得。但是，我们访谈过的几个大型的外来工聚居点，每个都至少有 2000 人以上，其中有三个外来工聚居点，由于其超大的规模，我们估计每个至少住有 5000 人以上。而在贵屿，这样的大型外来工聚居点还有很多，因而我们认为外地人在贵屿的数量超过 10 万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在贵屿的外地人的来源地主要是四川、湖南、江西、安徽、贵州等省，其中四川古蔺、巴中和重庆人为数最多。在贵屿镇区和南阳等地甚至有直接回四川的长途大巴，并且保持隔日发车或每日发车，说明生意还是非常不错。在贵屿的外来人，出于和本地人的拆解业类型区域化类似的原因，每个省份的外来人大致都有较为固定的职业范围。而四川人是其中从事职业最广的群体，从工厂到饭馆到集市里的小摊到娱乐场所的三陪小姐，几乎每一种职业都有四川人的身影。四川人也是在贵屿的所有的外地人中最喜欢群居的人群：无论是在哪一个村，都有四川人的聚居点。

湖南人在当地的数量也很多，仅次于四川人。湖南人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北林和南阳两个区域，他们的聚居点在规模上丝毫不输于四川人。对这些湖南人，其他省份的评价非常含糊而复杂：进工厂打工的湖南人非常勤恳而老实，但是在贵屿游手好闲、小偷小摸的湖南人也非常多。

安徽人虽然数量不算太多，但是在当地的外地人中非常著名。在大家的描述中，安徽人是本地捡破烂者、乞讨者的主要来源，而且虽然个个其实都很有钱，但是在外表上就是故意要穿得破破烂烂的。他们也不愿意花钱租房，而是喜欢在偏僻的郊外自己扎一些窝棚居住，甚至睡在大街上和桥洞里。同时，安徽人又是来本地的外来人中发得最早的一批人：他们从很早就开始收集当地人扔掉的塑料、废旧电路板、电子元件等等拿去卖钱。由于早期当地人也不知道很多废料其实可以出售，因此他们都把那些废料扔进河里、扔到荒地，而精明的安徽人把它们掏出来卖掉，结果赚了很多钱。

江西、贵州、湖北人在当地也有不少，但是他们集聚效应没有湖南四川人明显。这一方面可能源于他们的人员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可能也因为这几个省份的人聚居的习惯本来就不如四川和湖南人。（详见表 3）

表 3：外地人的来源及分布

来源	人数排序	分布	职业	备注
四川	第一	各村都有	各行业都有	以巴中、古蔺和重庆人为多
湖南	第二	北林、南阳	烤电路板、拆电器	吉首，湘西为主
江西	第三	散居	三轮载货、工厂打工	上饶、鹰潭人为主
安徽	第四	散居、远郊群居	拾拣垃圾、乞讨等	
贵州	第四	散居	工厂打工	
湖北	第四	散居	工厂打工	
河南	第五	多数住在棉城、陈店、峡山等地	出租汽车司机、三轮拉客车主	信阳等地为主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贵屿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二元社区”的生活结构下，无论是来自哪个省份的外地人都不会在本地人聚居的地点里面居住。他们散居的方式，是在某个相对较大的外地人聚居点里面或者近旁租住一间便宜的房子居住下来。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问题——本地人聚居的地方，岂是这些外地人所能租住得起的？另外一方面，毫无疑问就是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无依无靠的外地人是这种紧张关系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一方。为了避免可能的伤害，他们只有群居在一起，哪怕是加入到其他省份的群体中去。因此，每次我们看见那些大大小小的外地人的聚居点，一种“新客家人”的想法油然而生。

### 中年夫妻——外地人的特征

在很多人的概念里，一说到外来工，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珠江三角洲的那些服装厂和电子厂里面年轻女外来工，或者就是各个城市建筑工地上衣冠不整的成群男工。但是和那些外来工相比，贵屿的外来工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中年人为主：**在贵屿，最经常看见的外来工都是 30 岁以上，已经开始略显苍老的中年人。除了在娱乐场所，年轻打工妹非常少见。在我们的整个的访谈过程中，遇见的 25 岁以下的年轻打工小伙子不超过 10%。和年轻人相比，这些中年人显得成熟、踏实而勤劳，虽然已经没有年轻小伙子的体力，但是给人的感觉上似乎更加稳重。一些当地人在访谈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年轻小伙子做事情麻利些，但是没有耐心。这些已经有家有口的中年人，做事情比较让人放心。

**夫妻结伴为主：**大部分的中年人都是夫妻俩一起来到贵屿，单身的反而非常少见。除了正在怀孕和孩子还在哺乳期的时候，妻子会辞去工作在出租屋里照看孩子，一般情况下，夫妻俩都去工厂打工，或者做些小经营，以多挣些钱。为了节省开支，这些结伴来到贵屿的夫妻一般都和别的夫妻共租一个很小的房间。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在一个只有 10 平方左右的房子中，住着 3 对甚至 4 对夫妇。他们就在这样狭窄的空间里努力换取他们未来的幸福。

**超生问题严重：**在贵屿这个三不管的地区，本地人超生的现象非常严重，而有关部门一直疏于约束。对本地人尚且如此，对流动性非常大的外地人当然就更加宽松。因此，这里的计生管束非常宽松的说法传开后，四川、湖南、江西等地的一些超生户专门赶到此地来生育。这种风气传开之后，外地人在本地超生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非常多尚在育龄而又没有绝育的夫妻都会在当地再生 1 - 2 个孩子，尤其是在他们还没有男孩的情况下。然而，实际的情况是，以外地人在本地的微薄收入，他们根本就难以支付抚养孩子以及妻子停止工作的两年里所需要的费用。每次看见在那些拥挤的出租屋里，那些怀里抱着一个、手上还拖着一个孩子的忙忙碌碌的妇女，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总会爬上心头。

## 艰辛和单调——在贵屿的日常生活

在调查的初期，我们总是为在白天找不到合适的外地访谈对象而苦恼。那些进厂工作的外地人，每天早上 7:30 就到工厂里面做工，经过 9 个小时的工作和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在不加班的情况下，也要在下午 5:30 才能回到他们狭窄的出租屋里开始他们一天里属于自己的生活。就算是那些相对自由的小经营者和三轮车主，除了中午吃饭和午休时间，大多数时间也在外头。

然而，对于这些外地人来说，在贵屿的生活没有容易的时候。当地的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早已不能饮用，他们只能买水做饭和饮用。每隔上两三天，每对夫妇就要去买一桶水。这些从陈店运来的自来水，经过 9 公里的运输，马上由 1.5 元/吨变成 1 元/桶（约 40 公升）。当然还有更加便宜的，但是那样的水他们也不敢买。这样每个月在买水方面一家人至少需要 10 多元钱的额外支出：对于这些连 100 多元/月的房租都要 3-4 对夫妇来分担的外来工来说，这其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些狭窄的出租屋一般没有厨房，只有摆在屋里的简单厨具。在相互轮着做完饭以后，待到最后一家人也吃完饭时，一般都己经快 9 点钟。而再休息一会，到有电视的同乡那里看看电视，或者在外面稍逛一逛，9 点多到 10 点，他们就该上床睡觉了。哪怕在这大夏天，住着几对夫妇的狭窄出租屋是多么的闷热难眠，一天劳累的疲倦和明日的工作都在早早催着他们上床。

尽管这么简单的生活，接受调查的所有的外地人都抱怨说本地生活费用太高。每对夫妇每个月在房租、水费、电费方面的基本支出总是要在 5、60 元以上。而他们还需要每个月向当地的治保会交纳一个月 15 元/人“卫生管理费”，以及每个月 5 元/户“卫生清扫费”，以及还有其他很多需要缴纳的费用。因此他们就算是不吃饭，一个月也需要支付 100 多元，而本地物价是如此的昂贵，加上吃饭的费用，一对夫妇每个月的开支至少需要 500 元以上：如果夫妻俩都是打工的工人，那么这笔费用就已经花去了他们两人近 1/3 的工资。

由于个人的时间很少，也为了避免花钱，因此在贵屿的外地人，除了那些单身汉之外，平时出去串门聊天的很少。他们和朋友之间的联系，有时反而不如在家乡的时候。也正因为如此，每次有老乡和客人来访，他们都显得分外亲切而热情。

## 身份与差异——外地人的职业类型

在我们调查的初期，我们都想当然地以为，进工厂和作坊打工应该是外地人在贵屿的主要的职业。但是，到了贵屿之后我们很快就发现，在工厂和作坊打工只是外地人诸多的职业选择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

在许多外来人眼里，打工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的最后选择。在贵屿，打工的收入在不

同的区域价格会有差别，但总体来说不会太高。在华美和北林，比较常见的价格是女工 17 - 20 元/天，男工 20 - 27 元/天。龙港的塑料厂价格要高一些，男工一般会在 30 元/天以上。在南阳的男工一天大约为 25 - 30 元/天。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就算加上加班费，每个月每个人最多也就是 1000 元多一些。对于这些外来人来说，打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缺点就是“不自由”，“每天都要在固定的时间去上班”，“还要看老板脸色”。对于这些在家乡种地的时候享有很强的自主权的外地人来说，管理很严格的这些当地工厂和作坊当然说不上是一个好地方。

因此许多人就做了其他的选择。没有本钱，但是体力较好的，一般都乐意去做搬运工；稍微有些本钱的，就买部二手三轮摩托，略加改装，用来载货。贵屿当地的生产方式非常专业化，每一家作坊和工厂一般只负责拆解回收或者加工某几种特定的材料，比如电路板，塑料，铜，铝等。拆解下来其他的材料，一般都转手卖给其他的专门作坊或者工厂。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整个贵屿产生了巨大的转运量，为搬运工和三轮货运车主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我们在当地观察来看，大约有 20% 强的外地人在做搬运工和三轮货运摩托车主。三轮摩托载货由于需要车主帮货主上下车，因此每次载货的收入都比较高，但是花费的时间比较长。单纯的搬运工每次的收入不会太高，但是一般一次时间比较短。他们的收入与个人的体力以及熟识的老板数量有关。有些正值壮年的搬运工和三轮货运车主一个月能够收入 2000 元以上，就是比较普通的从业者一个月一般也有 1000 多元，要高于进厂打工的收入，而且还会有更加多的个人时间。

另外一些人在积累了一些本钱，同时找到合适的机会之后，就会转向去做小经营。经营菜摊，开小饭馆，开小杂货店，回收废旧电路板，开客运三轮摩托等等，这些小经营有很多外地人在做，尤其是四川人。这些小经营者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每月的收入从 1000 多元到 1 万多元甚至几万元一月的都有。他们通常会被同乡称为“脑筋比较活”的人。

还有少部分专业人员也来到贵屿，如医生、电工、电脑硬件维修技术员等等。他们由于有一技之长，一般或自己经营（如诊所），或者有稳定的工作（如电脑维修员），收入比一般的同乡都要高上不少，而且比较受同乡的尊敬，在同乡中享有较高的地位。

这就是贵屿的职业分布情况：外地人的职业选择范围，除了最后两部分，和当地人的职业选择重合极少。他们主要从事的都是当地人不愿意干的、较为劳累而收入较少的职业。和那些身家巨万的老板相比，这些外地人真的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 不停变动的零工和散工——外地人的工作方式

在贵屿的外地人有形式多样的工作方式。那些小经营的业主和专业人员，他们当然用他们喜欢、同时又方便赚钱的工作方式工作。就是那些搬运工人和在作坊里的打工者，他们的工作方式也有很多种形式。

搬运工人和货运三轮车主，一般都是在固定的地点等活。基本上每一个搬运工人和三轮车主都有固定的“地盘”，在没有活干时都在那里等着。如果有其他的陌生搬运工和三轮车主也来这里等活，其他几位互相熟识的搬运工和车主虽然不至于驱赶他，但是会联合在一起和他抢活。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拉货三轮车大多数都是四川人和江西人：如果没有同乡互相照应，在范围如此之小而同业竞争如此之大的贵屿，货源将会非常有限。

在工厂和作坊打工者，我们起初认为他们应该都是固定在某个作坊打工，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错了。那些做电器拆解的工人，他们的工作地点和雇主也是多变的。做电器拆解的作坊，最常见的情况是进一批货，找齐工人拆一段时间，然后就停工几天，等资金流转过来之后，再买一批货，然后再找齐工人拆解。一个单纯的电器拆解作坊每个月一般都要停工几天。因为等待的时候是没有收入，因此外来工们通常都不乐意浪费时间去等待。他们的对策是找到 6-8 个相熟的同乡组成一个小组，互相和熟悉的老板联系，只要有老板有货，就开始工作。因此，一个拆解工小组通常会在一段时期内同时为 4-5 个作坊打工。

只有在北林的烤电路板工，他们才可能固定在一个作坊或者工厂工作。因为这些作坊货源和产量都比较稳定，需要有常驻的工人每天为他们工作。然而，由于他们的工作相对简单，需要的体力和技能都较少，可替代性极高，因此他们的工作待遇也最差。龙港等地做塑料的工人有些也比较固定，但是这些作坊和工厂需要的人手相对较少，一个规模很大的工厂有时只需要几名固定的工人，其他的人员也都是临时再找。

### “一脚踢”的工资——进厂工人的工作与待遇

每天我们都能看见很多外地人在工厂、作坊里埋头工作，甚至无暇抬头向外张望一眼。在这些非常简陋的工场和作坊里，并没有必要的保护和净化措施，工人们在污染严重的环境下直接工作。

在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中，对工人健康损害最大的当属北林的电路板处理和龙港的塑料颗粒原料生产。北林的电路板的回收处理的生产方式是将集成电路板直接拿到炉火上面烘烤，然后等到电路板受热软化以后，再将电路板上的各种晶片、电容，以及后面焊点上锡用钳子取下来。电路板受热软化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刺鼻难闻的气体——北林地区满大街的刺鼻气味就是由此而产生，如被人体吸入将产生严重危害。其实，就算这种烘烤不会释放出有害气体，光是在炎炎夏日中做在火炉边烘烤，就已经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然而，对于这样辛苦的工作，一般的作坊主提供的防护措施就是在这些工人旁边安放一个电风扇，一方面给工人降温，一方面将这些有害气体吹走。在多数情况下，由于作坊的工人密度很大，而整个作坊的换气设施并不完善，因而这个电扇也就只能起到降温的作用。每次走在北林的街上闻到那种烘烤电路板而产生的特有的刺鼻气味时，对里面那些正在工作的工人的感想的猜测总是让人无言而难受。

龙港塑料回收和加工生产，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产值来说，都可以称的上是贵屿镇电子垃圾拆解业的支柱。但是就在这个支柱产业的工厂和作坊里面，却也还是用最原始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在最后的塑料加工切粒的环节，工厂主和作坊主们在漠视环境污染和工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进行生产。在塑料在清洗之后，加工切粒之前，由于缺乏响应的识别设备，工人们需要通过点燃样品塑料，通过闻它们发出气味来识别塑料的种类，比如是否阻燃，是否含有甲醛等等。这种识别方式对于工人来说极为危险：长期闻嗅这些塑料燃烧气体，必然对身体产生危害。我们在访谈过程中，就遇见一位从事这个工作而身患重病的重庆外来工。

在塑料识别之后，塑料通过进一步粉碎，将被送入加热炉中融化成一条条细长的塑料，然后经过机械切割，将它们切为大约直径 1-2 毫米，长度为 2-3 毫米的塑料颗粒。这些塑料

颗粒是制作各种质量要求较低的塑料外壳的原料，在深圳、江浙一带有很大市场需求，因而本地的生产量非常大。然而，在生产这些颗粒的融化阶段会释放出大量的有害气体。根据美国巴塞尔行动网络和硅谷有毒物质联盟的有关分析，这些气体中极有可能包括二噁英、呋喃等剧毒物质。而通常这些生产厂商只配备有简单的换气设备，而没有任何的其他空气净化设施。

在我们重点调查的华美、北林、龙港、渡头和南阳，我们访谈的所有本地人和外地人，都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劳动合同、医疗保险以及职业病防护的事情。面对我们的询问，大多数本地老板觉得愕然，而外来工则觉得这样的问题天真可笑。在贵屿，老板和工人之间的约定是上一天班拿一天的钱。除非是在工作现场受的明显外伤，否则老板没有义务为工人的健康支付其他的费用，除非这个老板“很有良心”，愿意主动为这些外来工承担相关费用。这就是贵屿的游戏规则。

面对如此恶劣的生产环境和如此苛刻的劳工待遇，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就提了出来：为什么有这么多外地人甘愿接受这种工作和待遇？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问题。这些在贵屿辛勤打工的外地人绝大部分是农民，他们在家乡辛苦一年种地的收入，由于现今农作物的价格非常便宜，也就是一两千元一年，大约也就相当于在本地那些工资较低的工场工作两三个月的工钱。而在前几年，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农民要交纳的各种税费非常高，又使这些外来工处于一年之中基本没有利润的境地。比如四川巴中地区，在 2002 年以前，每个农民每年需要交纳的税费总额是 400 - 450 元，如果一家有 5 口人，一年光是税费就需要 2000 多元，那么这一整年大约也就是白干了。因此他们家乡的人都出来打工。“打工当然非常辛苦，但是还是要比在家乡种地好啊！”

还有一些外来工提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们说：“打工总是很辛苦的，老板也总是很狠心的。我也去过很多地方了，那些地方的老板其实还不是和这里的老板一样。我以前在广州的建筑工地上做，有时一天做 15、6 个小时，他们也从来没有给我买什么保险之类的。”其他的老板和这里的老板一样，这种说法也是支撑他们能够接受工场里面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苛刻的待遇的原因之一。的确，在广东甚至整个中国，对流动性很大的农民工的保障工作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绝大部分的外来农民工都从来没有享受过那些国企工人所享有的待遇。从来没有享受过，也几乎没有听说其他同乡有过，他们也就不敢奢望。

而当地人经商的一些基本准则，也为大量的外地人留在当地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和理由。贵屿人承继了潮汕的经商传统，对于经商的诚信原则非常重视。只要老板和工人谈定了价格，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地老板会将工资按时按月给工人。在当地，我们经常听见外来工抱怨当地老板打骂外来工，但是很少听见他们投诉本地老板拖欠或者克扣工资。外来工们在家乡的时候也经常出去打短工，或者搞点副业，那时他们所受的待遇基本也就如此：按工作付钱，付完钱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到此为止。因此，他们在接受这些工作时，并不会觉得老板的待遇过于苛刻。尤其是那些本来就同时为 4-5 个作坊轮流工作的工作小组，他们甚至还会觉得自己没有丝毫的理由要求当地老板为他们的权益做更多的考虑。

而且，他们认为他们现在出来打工只是为了赚钱，最终还是要回到老家去。“落叶归根嘛”，这是他们普遍的看法。大多数人都希望在这里辛苦几年赚点钱，然后回家盖栋好一点的房子，留点本钱做点小生意。只有极少数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再回家乡，或者说没有想

过这个问题。于是，“最终是要回去的”——即在贵屿的这些日子再艰难都是短期的，美好的未来正在家乡等着他们——成了他们在这里能够接受所有艰苦的条件的重要动力。

## 从一个世界看另一个世界——与本地人的关系

从外地人的角度来看，本地人是一群非常不可理喻的人：他们号称重视教育，但是多数人只有小学毕业；他们很有钱，但是整天用买非法的六合彩、赌博、吸毒和找三陪女郎；他们有很多子女，但是这些有钱人家的子女从来都不读书；他们号称对内很团结，但是村与村之间每年都有械斗事件；他们号称友善热情好客通情达理，但是对于外地人却是如此的敌视和野蛮……

对于最后一点——对外地人的敌视和野蛮行为，是我们在贵屿的访谈中听到的最多的抱怨之语。他们跟我们说起当地人在工场里面斥责和打骂他们，说起当地人的摩托车撞上他们的车之后反而要他们赔偿，说起当地人如何在大街上将怀疑为偷摩托车的三个外地人活活打死……然而，他们说起的最多的，是当地的治保会如何收费：在 2001 年之前，他们每个月要向治保会交纳 10 元办理暂住证。从 2002 年开始，国务院规定暂住证每年收费不得超过 50 元，于是当地就取消了暂住证，改收“卫生管理费”，每月 15 元，不降反涨。让外地人更加不理解的是，各个村之间的收费各行其是，互不承认，就算在南阳交过费用（南阳一交就是半年，而且每月 20 元/人），如果搬到华美之后，还得重新交费，否则被治保会抓住，不但要强行收费，还要罚款。

外地人评价当地人最常用的词语是“素质低”、“法律意识低”。他们一再引用他们家乡如何善待外地人的做法，来说明当地人的野蛮和不可理喻。四川人说他们如何热情好客，如何善待外地人；湖南人说，在他们那里，没有人会没事找事欺负外地人；贵州人则说只要有人来了，必然好酒相待……每次说到最后，他们的结论就是：这帮人，从小就一个姓和一个姓打架，又都不读书，一点“文化”都没有，你说，他们能不野蛮么？

于是，面对贵屿本地人个人和管理部门对外地人的双重歧视，外地人在本地产生非常严重的“客居”感觉。他们从来都不觉得贵屿是他们可以长期发展的地方。他们在贵屿的每一天都小心翼翼，担心和本地人发生冲突从而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在访谈中，很多外地人一再劝告我们晚上不要出来，更不要很晚还在街上活动，以免发生意外。

不过，在贵屿，外地人和本地人关系也和地域有很大的关联，或者说，和贵屿宗族的分布有关联。在民风最为强悍的北林，和宗族势力最为强大的南阳，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关系都比较紧张。而在宗族相对较为分散、经济也较为发达的上练片区（含龙港、渡头、仙彭、仙马等村），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关系明显较为缓和。

## 向往故乡——外地人的期望和未来

大多数在贵屿的外地人都保持了自己和家乡的联系。这群以中年人为主的外地人，他们在故乡还有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孩子，还有集体分配的土地。这是他们的大后方，他们知道一旦有需要，随时可以回到他们的大后方。当然，他们很清楚他们的责任：在家里的父母和子女，都需要他们在经济上的支持。几乎每一个外地人、每一对异地夫妻，都会定期寄钱回家：给子女上学，给父母养老，给弟妹上学，还有寄钱回家建造新房子。

他们和家乡这种密切联系的前提，就在于他们明确知道他们有一天终将回去。正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几乎所有的外地人都表示要回老家去：有些是为了年老的父母，有些是为了年幼孩子，还有则是认为人不管怎样还是要回到家乡才好。他们来贵屿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因而他们不会在意本地的污染，因为大多数年之后，积累了一点钱，他们就会回家，这里的一切的污染，这里工作和生活的艰辛将不再和他们有关系。

“赚了点钱后回家”，是他们共同的想法。但是回家之后作什么，他们的愿望却不太一样。大部分的外来工，都希望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也有外来工希望回家去从事养殖业，只有极少部分人还是愿意回家之后继续种地：农业的收入是如此之低，就算是从今年开始，各地的税费都大幅下降，但是种地的收入还是可以清楚地计算出来：也就是在贵屿 2-3 个月的工资而已。

在外面艰难的生活深深触动了这些外来人。他们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希望他们的孩子不会再重复他们这种艰难的生活。因此，在访谈中，他们表达的最多的愿望之一，就是希望他们的子女能够好好读书，能够考上大学，将来有所出息，不必再为了钱而如此艰苦地工作和生活。

## 小结：

在某种程度上说，贵屿的生活只有三个元素：本地人、外地人和电子垃圾拆解业。电子垃圾拆解业是贵屿生活的中心：本地人经营拆解业，他们有充足的资本、有高效的物流链，通过拆解业他们赚到很多钱。但是要经营拆解业需要大量而低价的劳动力，也需要很多低成本的服务业的支撑，因此，他们需要外地人。外地人则通过参与到拆解业的下游而获得他们需要工资和服务业经营收入，这部分工资和收入对他们来说远远高出在家乡的收入，因此他们能够忍受在本地工作的艰苦条件和苛刻的条件。就这样，电子垃圾拆解业把本地人和外地人牢牢地连接在一起，互相依赖。

然而，本地人和外地人又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在本地人的世界里，富足乃至骄奢的经济生活，传统的思想观念，和复杂的乡村权力结构，构成了一个外地人无法进入的世界。而外地人的生活则充满了卑微、艰辛和忍耐，他们的生活本地人也不屑于进入。本地人和外地人就这样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属于两个世界。

电子拆解也对贵屿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并引起来了世界性的关注，从而对贵屿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贵屿的未来变得模糊和不确定起来。对于这种情况，当地人一方面在巨压的惶惑之中选择坚守，另一方面却希望他们的子女能够离开这片饱受污染的家乡土地。而外地人对贵屿的未来却显得关注甚少，因为他们知道，终究有一天他们会离开这个客居的地方，回到他们的家乡。

注释：

- (1) 关于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有关情况，请见巴塞尔行动网络（The Basel Action Network, BAN）、硅谷有毒物质联盟（Silicon Valley Toxics Coalition, AVTC）的有关资料和网站。并可参见美联社 2002 年 2 月 28 日、阿根廷《号角报》2003 年 4 月 5 日等有关文章。
- (2) 周大鸣，外来工流动与二元社区，《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 年第 2 期
- (3) “下山虎”是潮汕风格的民居，砖瓦结构，一般为一层，多使用青砖作为材料。屋顶两侧有方形突起饰墙。典型结构是一间大厅，2-4 间侧房。多数无天井。
- (4) 数据来源：和当地政府、派出所相关人员的访谈数据。
- (5) 同上。本文所引数据，如非特别注明，均来自实际访谈和调查收集的资料。
- (6) 这里的现象和潘绥铭在其《存在与荒谬》描述的情况有很大相似性。可参见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潘绥铭著，1999 年
- (7) 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大腕》中的台词，2001 年
- (8) 赖芸译，调查报告：《出口危害：流向亚洲的高科技废物》，美国巴塞尔行动网络和硅谷有毒物质联盟联合制作。
- (9) 据当地资深的打井匠人介绍，由于内涝地形，贵屿镇区等地的水质本来就非常差。受了污染之后，就变得彻底不能饮用了。

## 第二章 贵屿的生产与组织

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都有畅通的渠道，形成了一套非常有效的产业运作模式。了解贵屿的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对于全面了解贵屿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但是，限于本文篇幅与本次调查的主要目的，本报告将主要关注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的产业组织方式的特征，以及它的具体的操作流程这两个部分。

### 2.1 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的特征

#### 2.1.1 无形的网络——基于宗族的生产与组织：

贵屿镇的拆解业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产业化经营的规模，卷入了当地 80% 的家庭，成为贵屿支柱产业和当地居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贵屿电子业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发展，出来本报告开头部分所说的环境生态和废品收购的历史因素以外，还和宗族有很明显的关系。

##### 2.1.1.1 宗族组织和上游货源：

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使用的原料从一开始就来自进口。国外的电子垃圾，通过各种手段进入中国之后，一般会囤积在广东的南海、广州、深圳等地。由于这些电子垃圾属于非常敏感的货物，因此交易变得非常的隐秘。贵屿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多年来在电子垃圾拆解业上节节发展，和贵屿当地的宗族组织非常发达，并且有强大的社会网络有直接的关系。

南阳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其他地区，尤其是贵屿镇镇区的电器拆解业受到政府的严厉监管而不断萎缩的时候，南阳的电器拆解却能够后来居上不断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代替了贵屿镇区而成为了当地电器拆解原料最重要的来源地。

南阳之所以能够发展如此迅速，的确和南阳的宗族有关。由于政府的严厉监管，能够顺利通过海关进入的电子垃圾越来越少，而从传统的货源点——南海、广州去拿货回来也面临各种严格的盘查，一旦被有关部门查出，全部货将被没收：无论对谁来说，这都将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损失。同时，贵屿的拆解业还面临正在高速发展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其他地区——如清远等地——的强烈竞争。这些因素使得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面临很大的困难，贵屿镇区——华美村的衰落也和这个方面有关。但是南阳乡通过其庞大的宗族网络，在南海等地找到了一批稳定的同宗供货商，并且设法使公路监管部门对他们的货物进行放行。这种非凡的网络使得南阳迅速崛起。南阳某地的两个老板，自从今年春节以来一直没有停工，每个月至少要拆掉十几车——40 吨的标准集装箱车——电器，成为贵屿几十家二级拆解作坊的主要货

源。

在贵屿发展的早期，华美村的崛起的过程和近几年南阳发展的情况几乎一样。而且当时由于政府部门的监管比较松弛，货源的组织还更加容易。在 1997 年的时候，华美一家电器拆解的大作坊，每个月光是铜都要回收 2000 吨以上。这么大的货源组织，完全通过几个在南海的同宗老板从南海用集装箱运来之后直接转卖给他。而同时，其他姓的老板由于没有他这样雄厚的实力以及和供应方的密切关系，能够获得货源无论从质量还是从数量上来说都不如他。

### 2.1.1.2 宗族和贵屿内部的生产组织：

贵屿的电子垃圾拆解业以家庭作坊生产为主，中小型工厂为辅的生产格局非常明显。在我们调查期间访问的从事拆解业的老板大部分都以作坊的方式进行经营。每家一栋三、四层的楼房，家人住在楼上，第一层则作为拆解业的作坊。有少部分老板积累了一定资本和行业经验之后，就建立起专门的工厂进行拆解处理。但拥有充足的资金来建立自己的工厂并非易事，这样的工厂在贵屿只占拆解业的小部分。

贵屿的电子垃圾拆解业在当地内部形成简单的区域化的分工协作。这些家庭式的拆解作坊，并不是对所有的电子垃圾都进行处理，而是选择一种或者两种特定的材料进行专门的拆解回收，如有的专门进行电器的拆解分类，有的专门进行塑料回收，有的专门处理电路板等等。电器拆解作坊在电器拆完，进行初步的分类之后，就会将各种部件如电路板、塑料外壳、电线、各种零件分门别类地卖给其他专门的作坊和工厂，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区域性的分工协作：南阳地区主要从事电器拆解；龙港、仙彭、仙马、渡头等地主要是塑料回收与生产；北林主要是烤电路板的作坊较多，港后主要生产丝花（塑料假花）；华里西既烤电路板又处理塑料；而华美村因为是镇区，靠近贵屿镇政府所在地，近年来受到不少打击，故而拆解行业日益萎缩，并逐渐向南阳乡转移。（见附图 2）

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探讨过的，贵屿电子垃圾的拆解业的区域集聚效应和当地的宗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从表面上看，贵屿当地的货源的再组织与分配有着非常大的随机性：有人有货，有人想买，交易就可以达成。然而，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宗族关系在当地的内部交易中占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贵屿毕竟是一个商业体系刚刚发展的小镇，并没有完善的商业信用的认证体系，因此，贵屿的商业运作基本延续了传统的“熟人经济模式”。比如，我们访谈中遇见很多这种情况，某个塑料收集和粉碎作坊可能只供应几个塑料原料生产作坊（或工厂），因为他们彼此非常熟悉，互相信任。这种信任使得他们之间不需要特别的信用认证过程，同时在货期、现金流和生产工艺等方面可以相互配合。这本来是商业贸易活动中非常常见的现象，但是，在贵屿由于宗族之间的争斗有很长的历史，不同宗族之间的信任相对较弱，而同宗族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则非常容易建立。因而，在贵屿内部的生产组织在宗族关系强盛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受宗族关系影响，“熟人经济”在当地很大程度上就是“宗族经济”。这既是贵屿内部之间生产组织的方式，也是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之所以依据宗族进行产业的区域集聚的重要原因。

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在调查也发现，越是小型的家庭作坊，抗风险能力越小，对于“宗族经济”的依赖就越大。而那些较大型的工厂，一方面他们的经营更加需要宗族组织

在贵屿的权力结构占有优势，以便在资源配置、税收管理、政策倾斜方面获取更多的优惠，但是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中，由于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他们又可以较多地打破“宗族经济”模式的制约。

## 2.1.2 低成本和高利润——贵屿拆解业的成本分析：

### 2.1.2.1 廉价的货源：

贵屿拆解业的货源主要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进口的电子垃圾，这部分货物主要通过南海、广州、深圳等地转运到贵屿。这是传统上贵屿分量最大的货源，但是随着政府监管的力度加大和其他各个拆解基地的竞争，近几年衰退的趋势明显。另一部分是龙港、渡头等地的塑料回收加工商，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货源：包括进口的塑料垃圾，以及从深圳、东莞等地批量买入国内的废旧塑料外壳。这部分的需求随着当地塑料加工业的发展，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无论是哪种货源，由于都以废物的价格买入，因此成本相对拆解后的售价来说非常低廉。虽然这两年随着上游供货方的供货方式的改变和货源的减少，贵屿拆解业在成本方面有所上升，但是整个行业仍然还是非常有利可图。

### 2.1.2.2 灵活的雇工方式：

根据生产的需要，这些作坊都会雇用一定数量的工人。雇工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长期雇佣的和短期雇用。在贵屿最常见的是短期雇用，因为大部分的作坊都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连续生产，而只能卖完一批，再进一批货。我们见到的普遍的情况是：每个作坊都会有几个熟悉的工人，当有货（原料）运来的时候，老板就将他们找来，由他们再去招募一些工人过来拆解。因而老板只要认识几个领工的工人就行了，到时再根据进货的多少来确定雇用工人的数量。货多的时候就雇的工人就会多些，反之则少些。大部分的外来工是为相对固定的几个老板干活，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工人处于游离的状态。只有电路板回收作坊雇佣的工人会长期雇佣工人，因为这些工厂的原料一般都非常充足，而且原料的价格不高。另外塑料回收加工作坊也会雇佣部分固定工人，但是，他们需要的工人数量不多。

### 2.1.2.3 极低的劳动力成本

外来工在当地的工资总体来说不会太高，加上上述的非常灵活的雇工方式，使得贵屿的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劳动力成本极低。在华美和北林，比较常见的价格是女工 17 - 20 元/天，男工 20 - 27 元/天。龙港的塑料厂价格要高一些，男工一般会在 30 元/天以上。在南阳的男工一天大约为 25 - 30 元/天。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就算加上加班费，每个月每个人最多也就是 1000 元多一些。（见表 4）

表 4：贵屿作坊工人工资情况表（单位：元/天）

区域	性别	工作内容	工资	备注
华美	男工	电器拆解	22-27	短期雇佣为主
	女工	塑料分拣与粉碎	17-20	长期雇佣为主
北林	男工	烤电路板	20-27	长期雇佣为主
	女工	烤电路板	17-20	长期雇佣为主
南阳	男工	各类都有	25-30	短期雇佣为主
	女工	烤电路板、塑料等	20-25	长期雇佣为主
龙港	男工	塑料颗粒原料生产	28-32	部分长期雇佣
	女工	塑料分拣与粉碎	20-25	长期雇佣为主

在我们调查期间访问的所有拆解作坊和工厂的老板，以及打工的外来工，没有一位提到本地拆解业有福利、保险、职业病防护方面的内容。除了有部分老板会支付在工作现场受到的明显外伤的治疗和医药费用，对雇工的报酬基本上完全包括在“一脚踢”的工资之中。

#### 2.1.2.4 低廉的各种税费

在税收方面本地作坊和企业的负担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我们访问的本地人之中，以家庭为单位经营的老板不需要缴纳任何税收，只要向政府缴纳一定数量的“管理费”即可（这些管理费通常连收据都没有）。但是较大型的工厂需要缴税，税额根据产量和销售额来定。但是，由于当地采用包税制，因此，他们可以设法让税额定得很低。访谈中我们遇见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当地中等规模的塑料加工工厂，每年的营业额至少几百万元，但是需要缴纳的各种税费全部加起来只要 2000 多元。

#### 2.1.2.5 低成本和高利润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除了生产原料——电子垃圾的获取需要一定的资金以外，其他环节的成本都极其低廉。就算是生产原料，由于其电子垃圾的本质属性，从当地的总体贸易的状况来看，也属于成本很低的范畴。因而，当地各类的拆解作坊都获得了非常丰厚的利润。贵屿当地的富庶就是这种利润的最好佐证。

正因为电子垃圾这种低成本、高利润的特征，使得当地居民大面积参与本行业，并且在收到严厉打压的情况下依然试图维持和坚守。

## 2.2 贵屿拆解业的产业链分析

### 2.2.1 贵屿当地的拆解作坊类型和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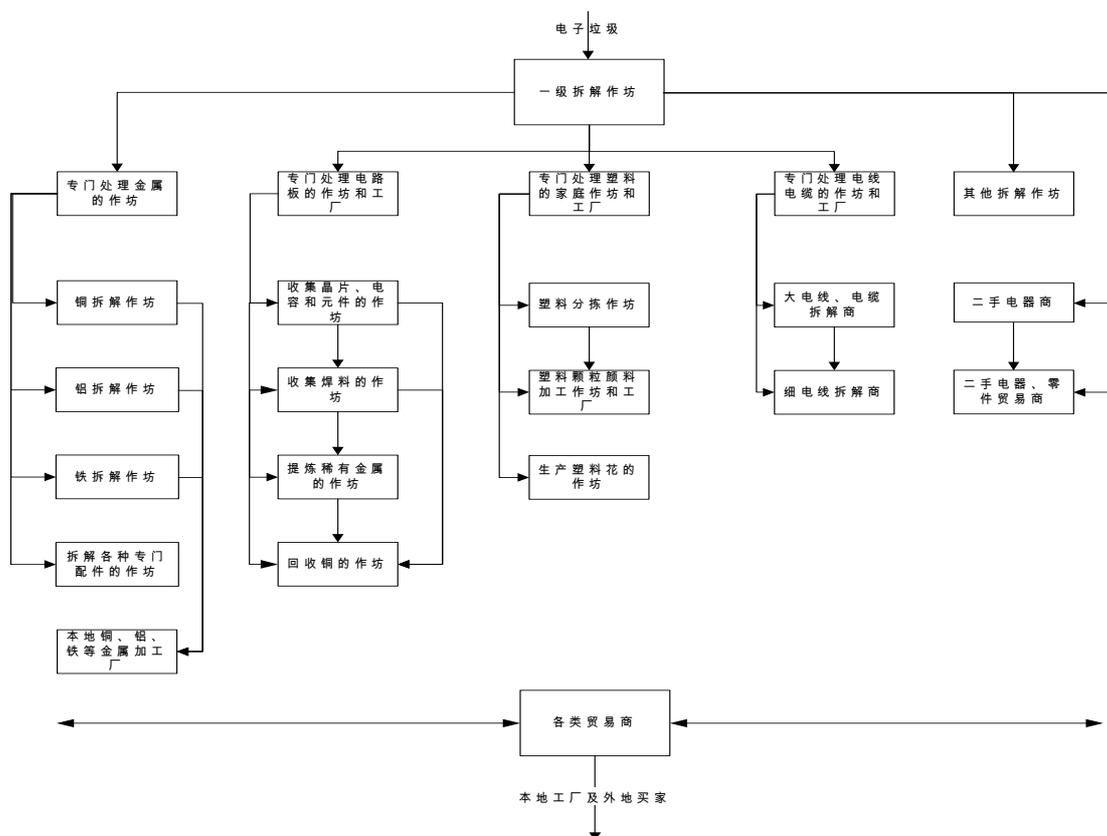
贵屿内部的产业链组织基本是按照各种拆解作坊来进行的，大大小小几千家拆解作坊连接了贵屿内部的整个产业链。

一级拆解作坊：多数是大型的金属回收拆解作坊，它们的特点无论什么样类型的机器它们都拆，而且数量巨大。它们一般从供货方直接拿货，南阳等地的大型拆解作坊还有专门的供应商供货。货物运到之后，它们先进行简单遴选，将可以使用的二手电器挑出转手给二手电器商。同时，他们也会挑出自己不需要的某些类型的电器转手给其他的二级拆解作坊。然后它们就开始组织工人拆解剩下的电器。拆解完成之后，由于它们本身一般都会回收某些类型的金属，比如铜、铁、铝等，留下需要的材料之后，它们再将各种分好类的各种材料转手给其他专门作坊。它们是其他专门作坊的主要货源之一。

二级拆解作坊：二级拆解作坊它们主要拆解回收各种专门的材料。它们是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的主体部分，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在早期它们多数情况下是从以及拆解作坊拿货，但是近几年它们也能够从外地供货方直接获得自己需要的各种专门原材料。

各种回收生产作坊及工厂：这是贵屿当地提升产业结构和完善产业链的自发经济行为的衍生物，并在近年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发展。这个类型的作坊及工厂主要有：上练片区数量巨大的塑料颗粒原料生产厂，华美村的国英铜业轧铜厂，南阳的铝合金材料厂和南安村的铁业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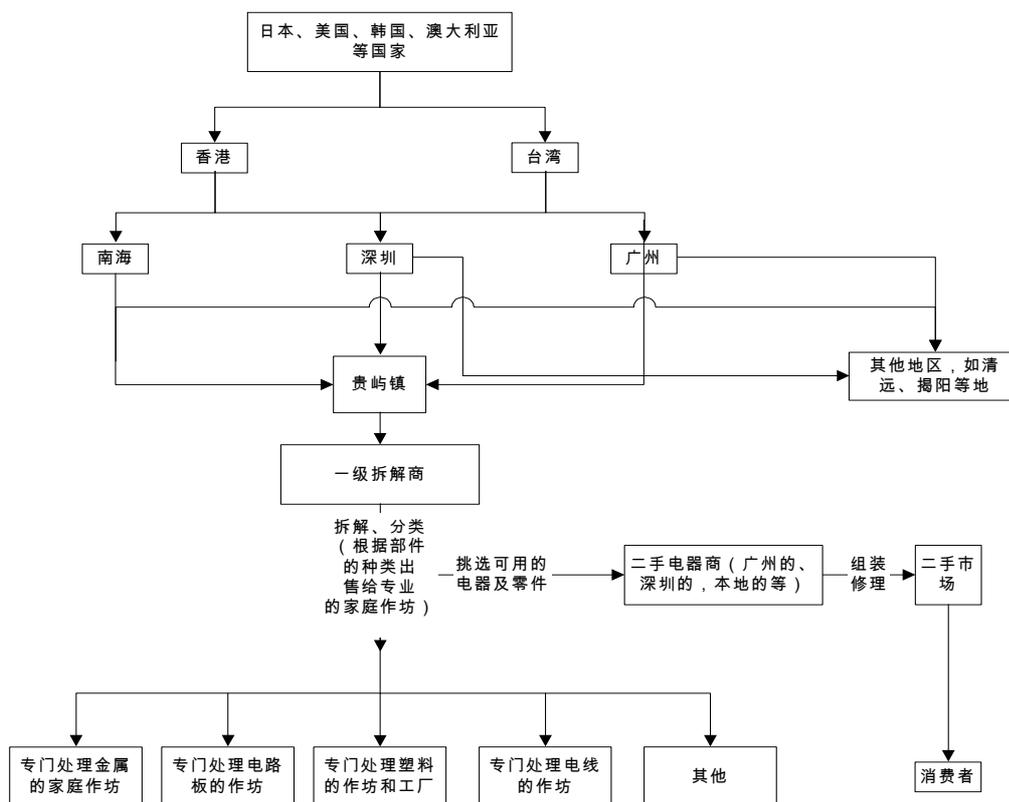
图 1：贵屿拆解作坊简单分类图



### 2.2.2 拆解产业链具体描述：

在对贵屿镇拆解业的基本特点和大体的生产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下面我们将从整体到局部来分析一下拆解产业链的概况（参见图二）。

图2：贵屿电子垃圾拆解业的物流图



### 2.2.2.1 废旧电器 ( 电子垃圾 ) 来源：

这些废旧电器 ( 电子垃圾 ) 主要来自日本、美国等国家，途径香港和台湾，然后再进入深圳、南海、广州等地。贵屿的大买主们 ( 有时会通过代理人或者委托人 ) 就会在那里经过讨价还价将货物接下来，最后以集装箱车运到贵屿自己的工厂和作坊里面进行拆解。电话沟通好之后，供货商也会直接将废旧电器送到贵屿大拆解作坊。也有货商从南海、广州等地将货物运到贵屿，然后在陈贵公路、铜贵公路或者谷贵公路上进行交易，这种情况多为分散交易，一车货一般卖给几个贵屿作坊，或者贵屿的几个作坊合作将整车买下来。运来地废旧电器种类繁多，电脑、电视、打印机、空调、微波炉，以及各种型号的复印机、变压器等等，一般各类拆解商根据货样和货商讨价还价，交易达成之后，拆解商将自己需要的货物买走，拉回自己的作坊和工厂拆解。

在早期，那些分散交易是也都是整车交易。贵屿当地的买主只能通过打开的集装箱舱门简单看看里面的货样，然后双方讨价还价成交。这种买卖方式对于买家来说风险很大：如果集装箱里面不能看见的部分全是廉价的塑料之类，那么这次交易就亏定了。但是如果整车都是大型电器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获取巨额利润。但是，在近几年，随着市场更加成熟，也为了适应当地越分越细的拆解业发展情况，卖家将分好类型的货物 ( 如塑料、大型电器、小型电器等等 ) 再运到贵屿来销售给各个专门的拆解作坊的情况更加常见。这种方式对于贵屿的买家来说，一方面减少了风险，另一方面来说，也减少了获取暴利的机会。

### 2.2.2.2 可直接利用的二手电器的流向：

将货物拉回之后，家庭作坊首先会将这些废旧电器按照种类的不同进行初步的分类，如电脑、电视机、打印机等各归在一起，同时将能够直接使用的电器及其零件挑选出来。各种电器，电脑、复印机、交换器，等等，只要经过修理、组装还能再使用的都会被挑出来。这部分机器和零件会转手给贵屿专门的二手电器销售商，或者直接卖给来自广州、深圳熟悉买家，最后流入广州、深圳的二手市场。

### 2.2.2.3 电器的拆解：

将电器进行人工拆解，将其按照材料进行分类。专门从事拆解的工人使用螺丝刀、锤、扳手、电钻等工具将废电器逐个拆卸，不断的将其化整为零。然后又由另外一批工人将其按照材料的不同分类：塑料、金属、电路板、电线等等。分类完成以后老板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自行处理一部分（一般是金属部门，比如铜、铝等等），剩下的东西就会卖给其他专门的二级作坊和工厂进行回收处理。

### 2.2.2.4 金属的回收利用：

当废旧电器被拆开后，首先可以直接提取的是一些金属，如铜、铁、钢、铝等，这些金属主要来自电器的内部架构、零件等。提取出来以后也需进行分类，如铜就可以分为红铜、黄铜、白铜等类。这些金属被收集起来后，主要销往清远、株洲等地的冶炼厂，以及福建、江浙等地的金属加工厂。贵屿当地开办的铜具加工厂、铝合金冶炼厂、铁具生产厂等，对这些金属需求量也很大。

### 2.2.2.5 塑料的回收处理（参见图三）：

塑料主要来自废旧电器的塑料部分，如电器外壳、显示器外壳、键盘等。贵屿的塑料回收处理主要集中在两个不同的回收生产区域，一是龙港、渡头、仙马、仙彭等地，这些地方使用这些回收塑料加工生产成为简单的塑料颗粒原料。二是港后地区，在这里一些相对较差的塑料会被做成丝花（塑料假花）。回收处理的流程大约为：

#### 一、塑料颗粒原料生产流程：

工序名称：分拣和清洗：一般在塑料分拣作坊完成（贵屿镇各区域都有此类作坊）。

第一步：分类：根据塑料质地、颜色的不同将其进行分类；

常见的塑料有如 ABS、PVC、PC、PS、PPO、PP、POM、MMA 等等。工人由于没有必要的设备进行检测，一般是将塑料点燃后，通过闻塑料燃烧的味道来分辨塑料的种类。这个过程对工人身体有极大的潜在伤害；

第二步：简单清洗：进行简单清洗，去除塑料上的各种贴纸、商标等等；

第三步：切片：清洗完成后，再将大块的原料用机器切成片状，然后放入碾碎机进行粉碎处理，这样就可以得到碎片状的塑料；（这个过程噪音很大，而且一般会有粉尘产生。）

第四步：再次清洗：将塑料碎片清洗（有时需要加入各种溶液清洗），有的作坊使用洗涤剂，有些作坊是直接装在编制袋中清洗；

第五步：晾干：将清洗好的塑料晾干。

流向及用途：转卖给本地丝花厂和本地塑料颗粒原料生产厂。

工序名称：塑料颗粒颜料生产：由塑料颗粒原料加工生产厂完成。

第六步：粉碎：用粉碎机将塑料碎片进一步粉碎成粉末状；

第七步：加热生产：将粉末状的塑料输入电子加热管（200 - 300 ），然后加热将塑料融化；（这个过程会产生有毒气体）

第八步：冷却：融化后的塑料从电子加热管里出来，成为一根根细长的塑料圆柱体，进入冷却槽冷却；

第九步：切粒：冷却后的塑料圆柱体将进入切粒机，切成直径约 1.5 毫米，长度约 2-3 毫米的塑料颗粒。生产完成。

流向及用途：转卖给深圳，福建和江浙的客户，用以制作低质量的塑料制品。

## 二、丝花（塑料假花）的生产方式：

分拣和清洗：一般在塑料分拣作坊完成。基本同塑料颗粒原料生产部分。

丝花生产：由丝花厂完成（主要分布在港后、华里西一带）

第一步：粉碎：用粉碎机将塑料碎片进一步粉碎成粉末状；

第二步：调色：放入丝花生产机，加入需要调色的颜料

第三步：加热并调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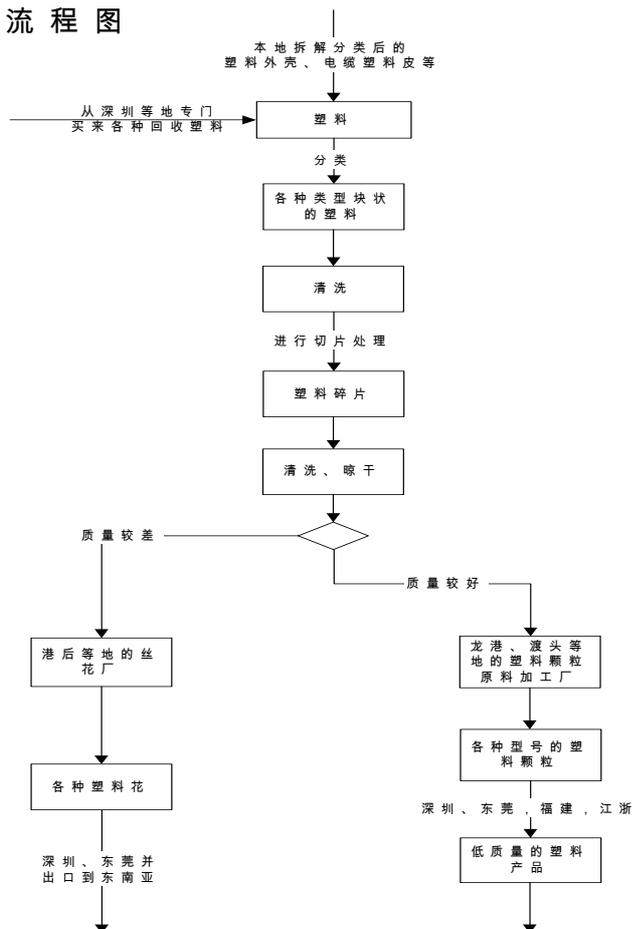
第四步：换模具：换好丝花生产机的生产模具头（每一种花、叶、茎都有特定的生产模具）；

第五步：塑型：按下按钮，机器将塑料溶液喷在塑料模具里

第六步：修剪并打包

流向及用途：转卖到深圳、东莞的玩具厂，部分出口到东南亚国家。用以装饰。

图 3 塑料拆解回收流程图



2.2.2.6 电路板的回收处理 (参见图四):

废旧的电路板上各种芯片、电容、极管等零部件，可以回收利用。同时板上还有镀金、锡焊料、铜骨架等各种金属。废旧电路板的回收利用主要集中在北林一带进行。其回收的主要流程如下：

工序 A：回收各类芯片、电容、极管。( 主要在北林，以及南阳和华美的一些地点 )

- 第一步：加热：将电路板放在煤炉上加热至软化；
- 第二步：提取：提取各种芯片，以及电容、极管等电子元件；
- 第三步：分类：对各种芯片和电子元件进行分类；

流向及用途：转手深圳、东莞的电器厂，直接用于生产新产品；

工序 B：提取焊料。( 主要在北林，以及南阳和华美的一些地点 )

第四步：加热：将已经去除各种芯片和电子元件的电路板放在隔有铁板或者平底锅的火

炉上继续加热。上面的锡等焊料会熔化滴在平底锅或者铁板上，将其收集熔化后出售。

工序 C：提取黄金：(主要在郊外，目前这种类型的生产极为隐蔽)

第五步：酸浴：电路板上的各种东西已经被取下，如电路板上镀金部分，则将其投入强酸溶液中；

第六步：还原：将强酸中的黄金还原成低纯度的黄金；

第七步：加热提炼：将低纯度的黄金进行进一步提纯，制成纯度较高一些的黄金；

流向及用途：出售用作工业黄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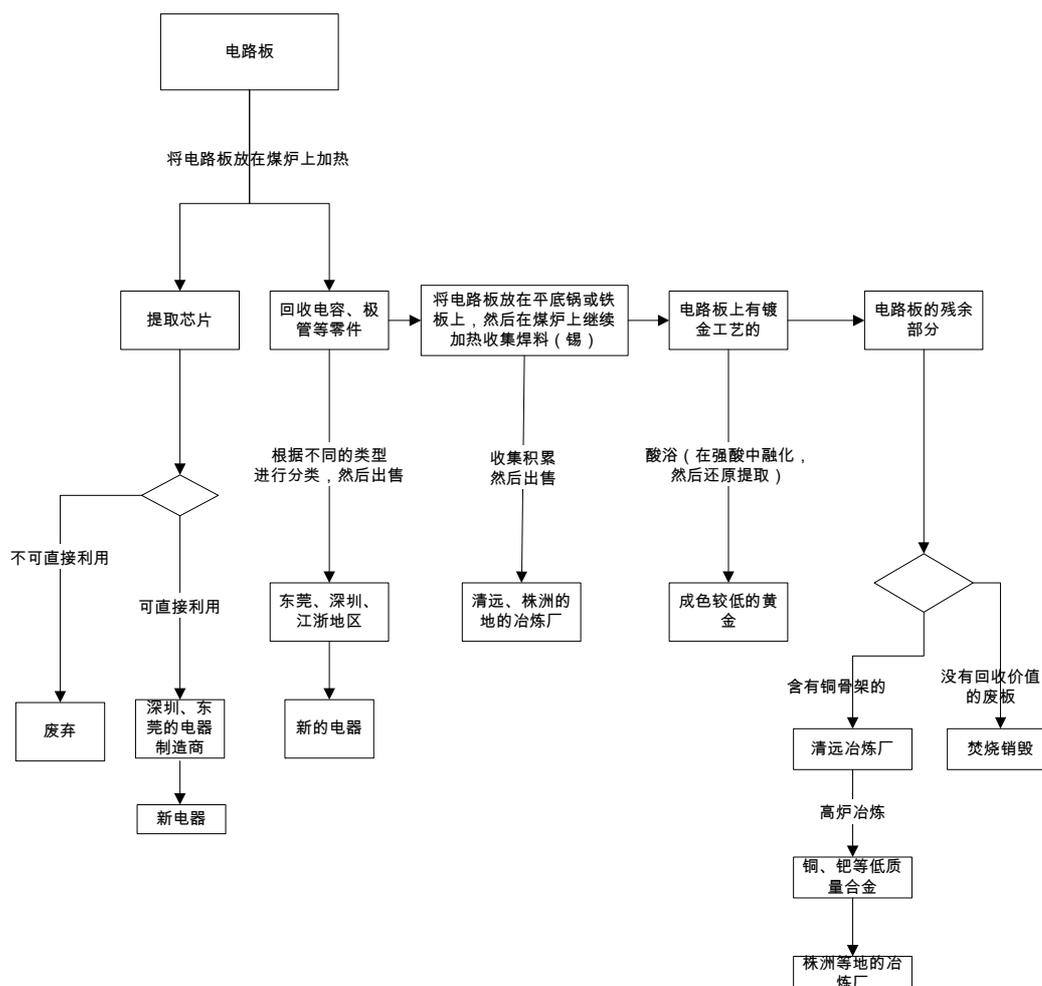
工序：提取铜。(收集后运往清远冶炼)

第八步：收集：收集各种已经去除了所有附属物的含铜电路板；

第九步：转运及冶炼：转运到清远进行高炉冶炼，冶炼成低品质的铜合金；

流向及用途：出售给株洲等地的冶炼厂进行分离、冶炼和提纯。

图4：电路板拆解流程图



#### 2.2.2.7 废旧电线的回收处理：

拆解的电器可以分理出很多的废旧电线。废旧电线可以分为粗电线（电缆）和细电线两种。对于粗电线通常使用专门的金属刀切割，可以提取里面的铜和其他金属，电线外面的绝缘体作为塑料回收。细电线则只能通过焚烧提取里面的铜和其他金属（一般会连同含铜电路板一起运到清远冶炼）。塑料绝缘皮卖给专门回收塑料的家庭作坊和中小型加工厂。提取的金属的流向有三个，一是株洲等地冶炼厂，二是销往江浙福建等地，三是本地的金属加工厂。

## 第三章 巨压和多方博弈下的贵屿发展

贵屿最受关注的方面，大约就是它未来的发展问题。无论是强烈关注污染问题的国际 NGO 组织和各类媒体，备受国际压力的中国政府部门，度日艰难的当地基层组织，还是当地居民，对贵屿的发展都有不同的期望。而贵屿将来发展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各方博弈的过程。同时，贵屿的发展还和它本身从事的拆解业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切，都不是贵屿人能够控制的。

### 3.1 各方势力的博弈

**国际 NGO 组织和国际媒体**，对贵屿的关注主要的原因在于其极其野蛮的生产方式和巨大的环境污染。目前国际上比较活跃的环保组织，对电子垃圾问题都非常关注，并有一批专门针对电子垃圾问题的国际组织（巴塞尔行动组织，硅谷有毒物质组织等）。他们的长期目标在于使整个电器生产行业更加环保化：从产品的设计，到生产，到流通，到使用，到回收都更加环保化。因而，对于他们来说，贵屿是一个非常好的负面例子：在这里，由不环保的产品设计方式的生产出来的电器产品，通过不合理的电子垃圾出口贸易方式，最终导致了一个小镇的严重环境污染。国际 NGO 组织对贵屿关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通过贵屿这个活生生的例子，透过新闻传媒的力量，向生产厂商或各个国家的贸易管理机构施压：要求生产厂商采用更加环保的设计，要求各个国家迅速签署并更加彻底地履行禁止电子垃圾进出口贸易的“巴塞尔协议”。

因而，国际 NGO 组织和媒体对于贵屿的期望主要在于希望贵屿能够从拆解业中脱身开来，进行产业转型并重整环境。而他们并没有对贵屿的直接影响力，因此只能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媒体对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强化对电子垃圾贸易的进口管理，促使贵屿镇进行产业转型，并且防止其他类似的拆解基地的出现。

**政府部门**在面临来自国际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巨大压力后，在 2000 年以来多次调整了关于进口回收物资的政策，收缩允许进口的电子类回收物资的范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彻底停止所有电子垃圾的进口可望在近年实现。同时，政府部门从 2001 年开始对国内的电子垃圾拆解基地进行整顿，其中就包括对贵屿的重点整顿。巨压之下，从 2001 年 3 月开始，汕头市、潮阳市分别对贵屿电子垃圾发展业布置了整治的目标、任务和期限，要求迅速解决问题。就在 2003 年 8 月中旬，国家环保总局会同五个部委前来贵屿了解当地拆解业的发展情况，并部署有关产业转型的工作。但是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通过对国外回收物资的进口和拆解，可以节省我国大量的资源。在其它回收物资还允许进口的情况下，大量

的夹带和走私就成为可能。因而对进口的电子垃圾拆解的管理和取缔，还需要时间。

然而，对于当地政府，尤其是贵屿镇政府来说，情况没有这么简单。贵屿镇已经基本没有了农业，除了电子垃圾拆解业之外的其他产业也极为薄弱，拆解业自从 90 年代初以来一直是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和当地财政的主要来源。当地政府直到本世纪初还在鼓励和支持拆解业发展。因而，要求当地镇政府在两年内对电子垃圾拆解业这一支柱产业和财政大户进行态度和方向上的一个大转弯，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面对来自上级政府机构的压力，和当地大面积从事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实际状况，当地镇政府的角色非常尴尬。首先，在某种程度上，镇政府没有这个权力要求居民必须转换行业。尤其是在今天，从中央到地方的提法是“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要求政府从具体的经济运作中脱身开来，让社会和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避免以往的“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规律”的做法。因此当地镇政府对拆解业主体的说服和介入工作常常受到很大阻力，甚至有拆解业主扬言要控告他们“行政越权”。

其次，镇政府需要面对当地强大的宗族力量。当我们问及上级部门有没有提议过说强行禁止当地的拆解业的时候，当地政府的一位官员很惊讶地说：“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如果硬性规定，那就不得了，下面肯定起来造反了。”为了佐证他的说法，他进一步举例说，为了抗议潮阳区教育乱收费的问题，前几天潮阳的上千个农民刚把广汕高速公路给堵了。因为许多按照国家教育部规定不允许受取的费用，潮阳区教育机构一直在收，因此他们就采用了这种措施。他进一步说：“仅仅是教育收费问题，他们就能把高速公路给堵了。我们这里很多村庄 80% 以上的家庭都在从事拆解业和相关的生意，如果我们禁止他们，那么后果肯定不堪设想。”而实际上，在我们和他访谈之前，他和镇政府其他的工作人员才刚刚到上练片区去制止了一次村与村之间的械斗事件。对于宗族势力能够发挥的组织力量，这些当地官员非常清楚。

因此，对于当地镇政府来说，唯一能够采取的办法就是一步步促使当地经济转型。首先，禁止在野外焚烧拆解之后的边角垃圾，禁止使用强酸用酸浴的方式提取贵金属，禁止烘烤电路板和街上乱堆放垃圾，对于违反者处以重罚。同时拆除了大量的生产窝棚并关停了大批严重污染的作坊和工厂。目前，这些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在街道整治，河涌清理和空气净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整体环境比 2001 年时期已经要好上很多。但是，对于那些没有那么直接、严重污染的物理拆解和塑料回收生产等等工艺流程，只能等下一步再说。

镇政府尝试过在北林、华里西和南安一带规划工业开发区，但是收效甚微，只好做了应付上级检查的“应付工程”。当地作坊之所以采用家庭作坊的方式，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节省成本。从家庭作坊搬到工业开发区，不但增加了厂房的租赁费用，而且对于管理、物流和雇工等方面都增加了种种不便，因此，几乎没有家庭作坊愿意搬迁。只有少数一两家实力较为雄厚的工厂在那里建了一两个小分厂。

镇政府也利用这两年拆解业不断下滑的局面，鼓励村民从事其他行业。对于计划从事非拆解业的村民，镇政府提供优先使用工业用地、水电等资源优先支持和小额无息或低息贷款等等优惠和支持措施。然而，要从一个行业转向另外的行业，当地人不但需要土地、资金方面的支持，他们还需要上游的物料供应和下游的销售渠道，因而，只有部分在某些行业已经有资源积累的人士才能进行，限制了其他人员的进入。从目前来看，部门居民向服务业的转

型成效不错，南阳乡部分居民向服装业的转型也比较成功。南阳在服装业的成功是因为贵屿邻近的几个大镇，比如东面的峡山镇、西南面的陈店镇和东北面的谷饶镇，是服装业生产和销售的大镇，有很好的产业环境。南阳通过其复杂的宗族渠道，通过和这些镇的相关厂家进行合作，很快就进入了这个新的生产行业并迅速发展。在 2001 年时，当地还只有不到 5 家服装厂，到 2003 年 8 月份，我们在南阳的粗略清点结果都已经有 28 家。其中还有 4 家规模较大的服装厂，占地面积都在 1000 平方米以上，有 3-4 层楼的大面积厂房。

然而，在贵屿上练片区进行卡式盒带的尝试却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当地人的看法是销路不好，卖不出去。然而，经过调查，我们认为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当地人使用他们回收的塑料作为原料生产的卡式盒带质量非常低劣，销路肯定会有问题；另外一个方面更加重要的原因是，卡式盒带作为一种即将完全被淘汰的产品，它能够提供的市场空间也非常有限，并逐年下滑。

鼓励当地拆解业升级和完善整个产业链，也是当地镇政府的一个促使产业转型和减少污染的一个措施，同时也是当地作坊的一种自发行为。如果当地拆解业能够进一步产业化，扩大规模，生成的工艺提高，也能减少污染，同时不对当地的经济造成冲击。比如当地原来有大量的塑料外壳边角料被抛弃，最后只有进行集中焚烧，严重污染环境。龙港的塑料回收加工行业，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 98 年左右出现的。龙港等地的塑料回收加工跳出了单纯的简单拆解回收的范畴，而是在回收的基础进行加工生产，做成各种不同质地的工业塑料原料，再销往深圳、福建和江浙等地。而另外的一些龙港也无法回收的质量极低的塑料，被港后地区的丝花（塑料花）作坊收去，用来做各种各样的漂亮的塑料假花，销往深圳并有相当部分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当地作坊的自发的市场行为，在得到政府的支持以后，的确在完善产业链、提供回收利用率和减少污染方面发挥了作用。

然而，上级政府对于当地的产业转型却没有那么长久的耐心，要求尽快解决和处理的污染问题，并促使当地进行产业转型。为此，上级政府刚刚撤换了当地镇长和镇党委书记。对于这种高压手段，当地基层官员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在当地的这种环境下，无论是谁来做镇长和书记，事情也都是一样需要慢慢来做。对于他们来说，换镇长和书记的唯一好处，就在于给当地人一个信号，说明上级政府的重视和他们工作的艰难，因而可以换取当地居民和宗族势力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当地居民**的看法更加复杂。在当地居民看来，他们从事拆解业本来就是一种被迫选择：谁愿意生活在饱受污染的环境里，但是，不做这个，他们能够做什么呢？贵屿从内涝区的贫民，到闻名潮汕地区的“收破烂的”，直到 90 年代从事电子垃圾拆解业才使得贵屿人真正开始积累财富。在发展的初期，几乎没有谁来制止他们，政府部门也鼓励他们发展。因此，面对外界近年来的责难，他们经常感到诧异和委屈。

对于相当部分的贵屿人来说，坚守拆解业将是他们在最近几年的选择。从一个已经就轻驾熟的行业转换到另外一个行业，意味着以前的在货源、生产、销售方面所有的人际关系和资源的积累的浪费。这些因素，连同从事一个新行业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都会使他们三思而后行。因此，这种对拆解业的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使他们对转换行业的念头感到迟疑。因此，在我们的访谈中，大部分的作坊老板（尤其是比较成功的作坊老板）对于将来都没有清晰的计划，而更多是选择了持续和坚守。

相信通过宗族的力量，能够向政府争取到一定的发展空间，这也是部分当地居民选择坚守拆解业的一个原因。他们认为，无论如何，政府不可能让他们“没有饭吃”。因此，在这个前提下，宗族组织的力量可以使他们在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争取到相应的发展空间。只要他们把一些重污染的项目逐渐减少，同时多发展一些低污染的替代性项目，和政府部门的协调空间就会加大。

还有一个当地人一直没有明说的原因是：拆解业的高额利润。由于大部分的在当地被拆解的电子垃圾和其他材料，都是以极低的价格买入，然后通过当地劳动力价格极其低廉的外来工拆解分类和简单加工之后，以相对较高的价格出售给下游厂商和买家。贵屿可以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迅速从一个“收破烂的”穷村庄发展到今天这样富庶的小镇，拆解业的利润空间之大可以想见。至今当地还在津津乐道那些一夜暴富的例子。而在当今整个潮汕地区经济已经初步发展的情况下，再要找到一个同样具有巨大利润空间的、同时又能容纳大批量从业者的行业已经比较困难。因此，在这种情况来说，坚守这个行业对于他们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

然而，当地人也无法忽视外界的关注和上级政府的直接压力所带来的影响，以及这几年来确实在步步下滑的行情。如果说他们相信内部的团结和宗族的力量可以为拆解业争取到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是这其中可能潜藏的风险和代价也困扰着他们。对于他们所无法控制的行情下滑，他们更是感到无能为力。因此，在很多次的访谈中都可以发现当地人虽然都表示说在考虑继续拆解业的生意，但是很容易看出的是，他们内心深处在深藏一种他们不愿意表达的惶惑。

正是在这种惶惑心情下，当地部分没有从事拆解业，或者介入不深的家庭，早在前两年就开始试着向多种可能的方向进行转型。他们分别涉及餐饮业、小杂货店、交通运输等多种行业，同时还有很多人在进行转型的筹划，比如筹划开办服装厂等等。于是，当地居民的态度越来越多元化，而这对于当地的发展来说，无疑是有利的因素。

## 3.2 拆解行业发展趋势

电子废品拆解业的特殊性质决定了这个行业独特的发展轨迹。电子行业的现有产业链存在先天弊端，在生产设计环节上对环保化回收问题的忽视，使得回收过程所需要耗费的成本极高。而同时，全球范围的资源紧缺使得在某种程度上对电子垃圾的回收又非常有利可图。于是，在国际贸易存在各种漏洞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发达国家的电子废料向发展中国家流入的现象。

但客观的说，废品总要消纳，电子垃圾拆解业也必须得到发展。正如在前面多处提到的那样，贵屿问题的关键不完全在于电子垃圾拆解和环境污染，而在于贵屿拆解的电子垃圾基本来源国际进口，而且主要的来源地是世界电子垃圾最多的美国。对于国际贸易相关问题的讨论和责难使得贵屿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典型的个案，一个象征。

随着政府的努力，“洋”电子垃圾的问题预计将会在一段时间后得到解决。但是，中国

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本土电子垃圾同样需要得到处理和解决。从整个行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如果电子垃圾的产业化处理问题在国内被提上议事日程，那无疑是电子拆解业的一个大转机。届时，拆解业可以名正言顺的和电子制造业形成相互依存的产业链结构。拆解商可以合法获得国内的电子垃圾，但同时需要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降低拆解时可能造成的污染。从目前的情况估计，政策的转变是拆解业能否充分发展和良性发展的大前提。

目前，在国内已有不少地方出现了类似的电子垃圾拆解基地，其中，既有和贵屿一样拆解进口电子垃圾的基地，也有拆解国内收集的电子垃圾的地点。贵屿作坊主不断抱怨说近几年的发展越来越差，其实和其他地区电子拆解业的发展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比如，清远地区的拆解业，由于依托当地原有的金属冶炼厂和冶炼技术，在处理很多类型的电子垃圾上比贵屿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从贵屿受到国际的密切关注开始，很多电子垃圾拆解已经转移到清远地区。在目前中国的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失衡区域经济格局，以及中国目前相对紧缺的资源环境，以“堵”的方式对待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发展，效果必然有限。通过规范的途径，制定电子垃圾拆解业的相关技术、设备和生产标准，使电子垃圾拆解业合理地发展，是一个相对较好的途径。

### 3.3 小结与建议

贵屿的发展问题已经超出一个区域的简单发展问题，它和国际社会、政府机构、当地居民和宗族势力的博弈过程，以及整个电子垃圾拆解业的行业发展都有密切的关联。由于多方势力的介入，贵屿的发展呈现一种模糊的态势，其真实发展还有待观察。

然而，可以预见的是，贵屿不会迅速放弃其发展多年的电子垃圾拆解业，而是会在延续该产业的前提下谋求产业链的完善和升级。这一方面源于当地居民产业依赖和宗族势力对当地产业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因为过去 10 多年的发展已经为当地积累了相当的资本和产业资源，已经具备产业升级的种种基本条件。

对于贵屿当地政府和关注贵屿发展的国际机构来说，容忍和鼓励贵屿的拆解业在当地的完善和升级，发挥当地的拆解业产业积累，并将其对国外的原料依赖转变为对国内的电子垃圾进行拆解，帮助贵屿建立起真正环保有效的拆解业体系，并抢占国内电子垃圾拆解业的先机，然后，在此基础上，鼓励当地进行产业多元化，将那些不可能进行环保化电子垃圾拆解的家庭作坊转向其他污染较小的行业，比如南阳正在尝试的服装业，将是一个比单纯打压当地现有拆解业更加实际而有价值的做法。

## 附图 1 汕头市潮南区地图



## 附图 2 贵屿镇简图